

全球對話

11.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 Dasten Julián 談社會學

Johanna Sittel
Walid Ibrahim

全球不平等 與疫情

Karin Fischer
Kajal Bhardwaj
Camila Gianella
Christina Laskaridis
Luckystar Miyandazi
E. Venkat Ramnayya
Viha Emandi

國家的 新角色？

Julie Froud
Andreas Novy
Richard Bärnthaler
Bob Jessop
Klaus Dörre
Walid Ibrahim
Daniel Mullis

理論觀點

Arthur Bueno

當社會學遇上藝術

Jenni Tischer

COVID-19: 疫情與危機

Margaret Abraham
Karina Batthyány
Esteban Torres
Mahmoud Dhaouadi
Alejandro Pelfini

議題開講

- > 公民政治學領域的社會學家
- > 千里達及托巴哥沈默的親密伴侶暴力
- > 論關照世界的能力
- > 人類作為文化人
- > 2011年7月22日的挪威恐怖襲擊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1卷 / 第2期 / 2021.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編的話

本刊物的「社會學對話」，討論了智利當前的發展。在這場由 Johanna Sittel 和 Walid Ibrahim 主持的訪談裡，從事歷史／社會學領域研究的著名研究員 Dasten Julián，談及了智利的政治發展、社會抗爭和不穩定的工作現況，以及這些現象與社會科學及社會之間的關係。

過去一年半，COVID-19大流行使得日常生活從根本上改變，導致了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自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對話》致力於深入瞭解全球發展情況。在本期刊物中，Karin Fischer 組織了一系列討論，針對印度、秘魯、英國、南非為疫情和全球不平等問題帶來的貢獻，進行系統性反思。雖然全世界的人口皆受疫情影響，但「我們並不是都坐在同一條船上」。疫苗的發展、市場化和缺乏可及性，以及疫情在健康、教育方面的影響，凸顯並強化了貧窮／富裕國家、全球南方／全球北方之間，以及遭受生態或經濟危機的弱勢群體，和那些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群體之間的全球不平等現象。

本刊物的第二個主題，將討論經濟與國家間關係的劇烈改變。提倡基礎經濟概念的學者們批評了過去幾十年的經濟自由化，指出主流思想的侷限，並呼籲在醫療、教育、食品、公共交通等領域提供新的模式，並與民主機構塑造和控制的基礎設施相結合。作者們也試圖討論，疫情當前不斷變動的國家角色，將對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帶來什麼影響、可能導致社會走向獨裁還是民主？社會學又如何受到新的國家干預主義挑戰？

在理論觀點中，Arthur Bueno 重構了過去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時代，這個時代導致了經濟、社會危機以及主體性的危機。藉由關注憂鬱症，Bueno 討論了從自我創業到耗竭、從自我實現到異化的轉向，並談及抗爭運動和專制政治帶來的影響，以及未來的前景。

藝術家 Jenni Tischer 則在文章中，解釋了她的兩幅拼貼畫如何讓隱形的勞動被看見，為有關疫情中必要勞動的論辯提供了一個觀點。

COVID-19主題中的一系列文章，則概述了社會學的一些挑戰。其中，Margaret Abraham 分析疫情如何伴隨著與日俱增的家庭暴力；Karina Batthyány 和 Esteban Torres 討論了社會不平等的議題；Mahmoud Dhaouadi 指出仇恨言論日益增長造成的影響；Alejandro Pelfini 則關注社會的學習過程。

最後，「議題開講」提供了理論思考，特別是關於相互競爭的人類概念，以及對不同國家關於暴力和關懷的最近事件和當代發展的討論。■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s://isa-world.org/)。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編: 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i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爾及利亞)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Abdur Rashid, Ashis Kumer Banik, A.B.M. Najmus Sakib, Bijoy Krishna Banik, Eashrat Jahan Eyemoun, Ekramul Kabir Rana, Helal Uddin, Juwel Rana, M. Omar Faruque, Masudur Rahman, Md. Shahin Aktar, Mohammad Jasim Uddin, Mohammed Jahirul Islam, Ruma Parvin, Sabina Sharmin, Saleh Al Mamun, Sarker Sohel Rana, Sebak Kumar Saha, Shahidul Islam, Shamsul Arefin, Sharmin Akter Shapla, Syka Parvin, Yasmin Sultana.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mad Mutallebi.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蘭: Justyna Kościńska, Jonathan Scovil, Sara Herczyńska, Weronika Peek, Aleksandra Wag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ziejew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ulian Gabor, Monica Georgescu, Ioana Ianuş, Bianca Mihăilă.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廖宇雯, 洪崇仁, 郭智豪, 黃翊碩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在這場和 **Dasten Julián** 的訪談中,我們討論了智利進來的大型社會運動、建立新憲法的後續過程,以及面對普遍存在的不穩定性,參與的社會學家可以在這裡發揮什麼作用。



COVID-19大流行暴露並加劇了現有的財富和收入、性別和種族的不平等——在國家邊界內,但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急劇。疫苗的開發、市場化和(缺乏)可用性,以及大流行病在健康或教育方面的影響,顯示並加劇了貧窮和富裕國家、全球南部和全球北部、已經遭受生態或經濟危機的弱勢群體和那些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群體之間的**全球不平等**現象。



本次研討會討論了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問題。與會者討論了國家對這一流行病的反應如何影響未來的治理形式,以及如何理解已經可以觀察到的國家干預主義的形式。是否有一種**新的國家干預主義**形式正在形成,如果有的話,它將具有威權或民主的特徵?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

> 社會學對話

危機之下的社會學： Dasten Julián 專訪 Johanna Sittel 和 Walid Ibrahim，德國	5
--	---

> 全球不平等與疫情

COVID-19 和全球不平等 Karin Fischer，奧地利	9
人命優先於利潤：新冠疫情的號角響起 Kajal Bhardwaj，印度	10
COVID-19 疫苗：揭示全球的不平等現象 Camila Gianella，秘魯	12
持續擴大的債務人與債權人分野 Christina Laskaridis，英國	14
非洲在減少貧窮與不平等上的挑戰 Luckystar Miyandazi，南非	16
印度的雙重災難——一項未完成的議程 E. Venkat Ramnappa 和 Viha Emandi，印度	18

> 國家的新角色？

基礎經濟作為社會改革關鍵 Julie Froud，英國	20
適合未來的經濟與國家制度 Andreas Novy 和 Richard Bärnthaler，奧地利	22
COVID-19：國家與經濟的新接合 Bob Jessop，英國	24
利維坦回來了！疫情國家與社會學 Klaus Dörre 和 Walid Ibrahim，德國	26
COVID-19：德國不安全地區的形成 Daniel Mullis，德國	28

> 理論觀點

憂鬱之後：後新自由主義方案 Arthur Bueno，德國	30
----------------------------------	----

> 當社會學遇上藝術

隱形勞動的視覺再現 Jenni Tischer，奧地利	33
--------------------------------	----

> COVID-19：疫情與危機

疫情中的家庭暴力 Margaret Abraham，美國	35
COVID-19 危機下的新社會學與女性主義 Karina Batthyány，烏拉圭、Esteban Torres，阿根廷	37
COVID-19 駭人的全球影響 Mahmoud Dhaouadi，突尼西亞	39
後疫情時代的假想情境：從調適到集體學習 Alejandro Pelfini，阿根廷	41

> 議題開講

公民政治學領域的社會學家 Fredy Aldo Macedo Huamán，墨西哥	43
千里達及托巴哥沈默的親密伴侶暴力 Amanda Chin Pang，千里達及托巴哥	45
論關照世界的能力 Francesco Laruffa，瑞士	47
人類作為文化人 Mahmoud Dhaouadi，突尼西亞	49
2011 年 7 月 22 日的挪威恐怖襲擊 Pål Halvorsen，挪威	51

『在許多情況下，經濟的增長是通過人類的痛苦和環境的
災難來實現的。』

Francesco Laruffa

> 危機之下的社會學： Dasten Julián 專訪



| Dasten Julián.

Dasten Julián 博士是智利南方大學歷史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一位學者／研究員。他目前正在一項由智利國家研究發展學會資助的計畫中擔任主要研究員：《智利南部廣域的工作不穩定：毛萊、紐布萊、比奧比奧和阿勞坎尼亞地區的交織、領土與抵抗》(2020-2023)。他也是南非金山大學社會、工作與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助理。Dasten Julián 畢業於德國耶拿的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學，其研究主題包括：工作和生活的不穩定化、工會策略和組織、剝削主義、公共社會學，以及全球南方的相關研究。他的研究皆是在與民間社會、工會和非政府組織的緊密合作下進行。

在這篇文章裡，Julián博士接受了 **Johanna Sittel** 和 **Walid Ibrahim** 的訪談，他們皆為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學工業與經濟社會學系的研究助理。

2019年在智利的社會抗爭是如何發生的？我們知道，這些抗爭活動是由上漲的公共交通票價所引發；是這一點稻草壓垮了駱駝，還是說，從公共服務的狀況以及其引發的衝突，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的狀態？

這起社會抗爭起源於 Augusto Pinochet (1973-1990)的軍民獨裁政權所強制創立的憲法，系統性地消滅民主力量，並在1980年實現了欺騙性的公民投票。在拉丁美洲，智利是唯一保留軍事獨裁時期憲法的國家；其持續存在於社會生活中，並以各種形式發揮作用，以殘酷而徹底的方式為新自由主義政策打下基礎。五十年來，在此種肆無忌憚、前所未有的商品化進程下，智利社會一直處於極度不穩定和被掠奪的狀態中。

這樣的狀態，與1990年以來掌握智利政權的兩個勢力之間所擁有的政治共識脫不了關係。這

些勢力透過兩個面向來維持新自由主義秩序的首要地位：其一是信任市場作為福利分配和社會融合的實體；其二是以皮諾契特憲法，阻礙政治制度的民主化。1990至2019年被稱為「民主轉型」時期，意指為了回復特定的共存基礎，以及社會中民主組織的存在，而進行的逐步民主化過程。然而，當經濟模式出現高成長率時，制度與體制內的政治行動者卻阻斷大眾參與政治與決策的管道。

>>

政治系統和公民的距離越來越遙遠，對政治系統的不信任與去合法化的整體進程，也正逐漸醞釀。經濟關係的勾結、不正常的競選金流案件、法院對商人有罪不罰等現象，皆是社會仍無法脫離獨裁時期權力鞏固網絡的症狀。「智利覺醒」的口號反映著人們在此時刻中良知、認同與權力上的揭露與反叛，正如政府的「戰爭宣言」、侵犯人權（在法院的正式投訴有8827件）、監禁示威者（多達27432人）等行為，呈現出形式政治中盛行的專制、保守和軍事內涵。

智利的抗爭結合了深具差異的主體性和地域性；年輕人、女性、長者、原住民、移民等等，在自主、合作下發展出結盟的抗爭劇碼。在私人與公共場域的政治記憶，於世代之間的相遇之下，過去與現在結合，政治在美學、藝術創意、音樂、街道、鄉村地區、集會、對話與佔領虛擬空間等面向中展現出來。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曾經深入地在文化、政治與象徵上重新相遇，並與「尊嚴」做為一個目標、習俗交織在一起。因此，此一相遇揭示的，即是智利社會的原始、構成要素，以及其社會契約、基礎與憲法。

你如何看待目前憲法的建立進程？有什麼樣的行動者為此站出來？社會科學在這之中是否扮演重要角色，還是這個過程是由法律專家所主導？

2020年4月26日，也就是一年前，智利舉行了全國公投，有700多萬人參加。超過78%的選民（約580萬人）同意制定新憲法的必要性，並同意新憲法的制定應由當選大會（制憲會議）成員者執行，而國會議員不應該參與。由於投票的自願性質，約50%的登記選民參與投票，創造了歷史性的參與率。

如今，憲法制定的進程正處於關鍵時刻，因為制憲大會成員的選舉將於4月11日舉行¹。制憲大會的組成涉及一系列有關性別平等和原住民參與的討論，這不是選舉的問題，而是政府干預和政治游說的問題，我們應隨時對國會的決策過程保持警惕。這種集體的警惕，顯示決策的過程是被體制綁架的，並為制憲時刻賦予了一層新的政治意涵：政黨制度的振興。

雖然反抗行動有反黨的性質、注重群眾行動，並保有對政治制度的批判，但最終引導、塑造制憲

進程的仍是國家機關。從候選人在登記、資金和媒體方面遭遇的障礙可以發現，與作為政黨成員的候選人相比，獨立的政治勢力及其候選人，不得不面對許多不平等與困境。這阻礙了獨立組織的發展，更不用說其中有許多政治勢力早已四分五裂。

疫情的肆虐使得討論、擬訂提案的辯論和會議空間受到限制。社會科學發起了一系列的反思，以批判與反身性的角度思考此過程，並以對侵犯人權的譴責與集體覺察為目標，從學術慣習中起身、承擔公共角色，迎向當下的挑戰。然而，相關行動大多仍局限於虛擬領域或書籍、科學文章等傳統媒體；這使其影響與規模顯著降低。即便如此，社會科學還是讓公眾對參與、科學與知識間的關係有了更多認識。

在你的社會科學相關工作中，哪些部分在智利近來的政治議題中扮演著特別的角色？有沒有什麼特定的領域或問題，是與社會科學和政治工作的結合特別有連結的？

我的研究關注的是勞動與生活的不穩定性。我致力於解釋智利社會中勞動和生活的特點，並考量到鑲嵌於權力交織點之中的文化、個人、經濟和領土等因素。我的目標是和社會、環境與工會組織建立一個地方性的工作平臺，改變其與全球研究網絡的連結，並加強國家社會科學界在勞動研究方面的凝聚力。

由於我一直在調查社會不穩定的過程和勞動世界，我已經能直接地看到工作、就業和失業是如何被認為是人們生活條件的關鍵因素。就業品質、薪水、自動化、收入、平臺的引入以及社會權利體系的薄弱，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負債、尋找非正式工作或尋找一份以上的工作，都是尊嚴和生活不穩定議題的一部分。其中，許多的問題貫穿了智利的政治和社會爭端，也顯示了年輕人、婦女、移民、老人等族群的不穩定狀況。

當情況迫在眉睫時，社會科學是否要負起什麼樣的責任？或是你認為科學將如何在不同的時局中發揮功能，尤其是長遠來說？

許多人、許多團隊一直致力於加強社會科學和社會之間的橋梁，目的是讓人們看到，並強調科學

>>>

知識在決策、行動和民主審議中的重要性。學術研究與公共領域之間——尤其是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這種隔閡是需要被克服的。事實上許多運動，如女性主義、環境和其他運動作為案例，已經讓我們對這樣的接合有了一些概念。

對社會科學來說，其責任在危機時刻更加被凸顯出來。衝突經常是危機的症狀，同時也是變革的預兆。此過程往往是社會科學的參考點。就我個人而言，我的社會學實踐是對於當前迫切情況的一種回應。社會上發生的戰爭、掠奪和不穩定，使我不得不在一個非常現實的意義上採取行動，這是不穩定、脆弱和不確定時間性之可能性的一部分。由於阻礙了未來的想法（可能伴隨著烏托邦的缺乏），其不僅有矛盾與消極性，同時卻也傳遞著一種新的、更實際的、積極的，在知識中鍛造烏托邦的方式。

你的研究結果是否在公眾以及科學以外被理解，政治行動者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發現又是否感興趣？

我的經驗顯示情況確實如此。但我認為，問題不在於是研究結果是否能被看到，而在於是否確實有建立管道與網絡，讓知識能在其中被交換、對話、分享和再創造，使得與組織、協會、工會之間的持續溝通得以存在。我們嘗試以在這些對話空間產出的診斷為基礎、透過在現實中界定的問題來調整研究議程。我們致力於發展一個和諧共存的取徑來回應全球科學的挑戰與本地的公共問題。

這也是「南方工作研究小組」（GETSUR）誕生的原因。GETSUR 是一個地區性工作平臺，依靠著全球研究網絡，試圖強化社會和貿易工會組織的架構。我們提倡與工會組織需求的協同和共生，為此，我們讓大學在基礎設施和後勤，以及知識和研究能力的面向上，皆能為特定問題的培力、資訊和／或反思提供協助。

十月起義確實是對社會科學而言，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作為科學家，我們正見證自己的覺醒，以及參加並成為其中行動者的可能性，也讓人感到振奮和新鮮。我相信，不穩定性和不穩定的概念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之一，使我們能夠沿著這條路徑前行。

你的研究主題是關於不穩定性、勞動市場的不安定，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社會的再生產。然而，你也參與在讓 Temuco 的居民與政府機構合作進行回收的計畫中。你能夠和我們簡單說明這個研究經驗，並指出此種社會學研究的問題與挑戰嗎？

當然。這些經驗是我隨著一路走來發現的各種線索而出現的，在好奇心、教育與敏銳度的引導下，這些線索促使我與在地的其他行動者合作。在回收經驗中，我與智利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合作，名為RADA；與這個NGO合作的還有與許多社會運動組織，例如 La Araucanía 與 Wallmapu 地區的領土組織、馬普切（Mapuche）社群等。他們為 Temuco 城市的廢棄物管理和處理擬定了一項策略和「零垃圾」方案，並為此在2017年向一個環境保護的公共基金成功提案。

2016年12月，該市自1992年以來一直運行的垃圾掩埋場關閉後，我們才開始了這個案例。垃圾掩埋場已坍塌，並污染了當地地下水。掩埋場設置在該市西部的22個馬普切社區中間，對周圍居民健康造成的後果在幾次調查中皆得到證實，政府也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上進行投資，作為犧牲環境後、面對譴責的緩解手段。污染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生活條件和環境；但是，在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許多人在垃圾掩埋場中，找到了透過回收和銷售廢棄物來維持經濟生活的可能性。

這即是我們在2016年對非正式的回收者，即垃圾掩埋場的拾荒人進行登記的原因。在掩埋場關閉前，我和RADA合作成立了回收者工會；該工會有62名成員，有些是來自該部門的馬普切人，有些是來自特木科貧困地區的人。其中的大多數人，把這看作是一份家庭工作。在這項任務中，我有一個社會學學生陪同，他對掩埋場關閉過程和回收做為經濟替代品之產生進行了研究。正是在這項研究中，面對工會提出的尋求和設計生存經濟空間的建議，我們想到能以生態方式進行環境保護的提案。

在你看來，穩定性和地方環境倡議這兩個研究領域之間有何關係？

我認為兩者的關係，可以從我前面和你說的經

驗體現出來。在前述的經驗中，我們開始在相互關係的第一個節點上進行討論：回收人員在日常工作中的不穩定性，以及生活在回收部門的馬普切人的不穩定性、還有他們需要在垃圾場忍受的環境種族主義。這兩種類型的穩定性，是與我們理解發展、社會、工作、自然和生活的方式相互交織的。它們共同存在於這樣的衝突中——垃圾掩埋場的設置、運作、關閉。

垃圾，作為以消費為中心的社會的產物，以及其生態不永續的物質性，向我們展示了不穩定性如何於此而擴展開來。靠垃圾生活的工人；人們準備在垃圾中吃飯或尋找食物；極端貧困和社會忽視。這就是為什麼在垃圾掩埋場關閉之前，在回收方面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勞動形塑了一個新的社會驅逐區域，身處其中，將更難擬定堅持與生存的策略。工會的形成並不是政治力量的保證，因為制度的框架將暴露工人組織的脆弱

性，同時也讓我們思考如何闡述一個有效的替代方案。

一系列的危機正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因此，重點不再是風險的增加，而是生活的不穩定性的增加。我相信，當前的政治衝突引入了一種政治感知，特別是女性主義、環境的和非殖民主義的知識運動，邀請我們重新思考，如何面對貪婪的、掠奪的和戰爭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緊迫、危機感和承諾。■

來信寄至：

Dasten Julián <dasten@gmail.com>

1.選舉已因疫情關係延期，並將於2021年3月15日舉行。

> COVID-19與 全球不平等

Karin Fis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奧地利

「在許多情況下，經濟的增長是通過人類的痛苦和環境的災難來實現的。」

新冠病毒的感染是無差別攻擊，也不分國籍的。根據聯合國發展計畫，人類發展指數（一項綜合教育、健康和生活方式的指數）正歷經自1990年來的首次下滑。這樣的下滑情形將會席捲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不管是富裕的或貧窮的）。

這樣的情形絕不是要呈現出一種「病毒是平等的」幻象。COVID-19疫情顯示我們並非在同條船上。如同聯合國秘書長António Guterres指出的：「雖然我們在同一面海上，但有些人在豪華遊艇上，其他人則是緊攀著漂浮的殘骸」。這場疫情揭露了在國家疆界內既存且持續惡化的種族、財富收入和性別的不平等，而在全球尺度的不平等更是嚴重。

疫情帶來的高度不平等現象從一般家戶、地方層級政府到國家層面等不同尺度中觀察到。這則專欄文章將會聚焦在以更大視角來分析不平等，例如全球南方和北方的不平等。富國和窮國間深植的不平等反映在三大主題：一是疫苗、科技和治療資源上的不平等、二是國債和財政不平等，最後是氣候變遷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一篇是Kajal Bhardwaj 的文章，闡述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更加重視智慧財產權與私人利益，而非「健康人權」。企業壟斷的權力激起一股看似是疫苗帝國主義或有疫苗和無疫苗國家狀態的隔離，造成搶疫苗和不公平分配疫苗的情景。Camila Gianella在他的文章中分析全球疫苗採購戰中遭受不平等的祕魯。儘管祕魯疫情中感染和死亡率在拉美是很高的，但輝瑞藥廠在祕魯拒絕疫苗採購協議中的部份條款後，將祕魯排在疫苗供貨的最末名單。

疫情和由此而來的全球衰退正使各國陷入債務陷阱。這不只是窮國才會面臨的問題。根據全球主權債務監管在2021年的調查，148個全球南方的國家中就有132個面臨嚴重債務。Christina Laskaridis 指出在疫情中主權債務的不平等。他明確指出和債務有關的政策是強國間力量的角力問題，也關乎人們的生存境況。Luckystar Miyandazi 針對全球獲利分佈不均補充說明：非法資金是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榨取，最終流入個人、貿易合作夥伴、跨國公司和全球北方避稅天堂的口袋。她寫道，非洲每年損失的資金幾乎與官方發展投資和外國投資的年度總和一樣多。這意味著這些國家沒有財政空間來發展經濟、或為應對 COVID-19 的特殊社會保護計劃提供資金。以尚比亞為例，償債義務和非法資金外流將進一步扼殺尚比亞的經濟並阻礙其長期發展。

此外，E. Venkat Ramnappa 和 Viha Emandi 則關注印度部分地區中，疫情和生態脆弱性呈指數增長的現象。他們指出，疫情下的社會和經濟衝擊因缺水、洪水或颶風等生態災害而進一步惡化。同樣，環境災害的後果呈現不平等分佈，且主要影響那些已經因疫情而受苦的人。

COVID-19 是一項全球性的挑戰。然而，當問題越接近、挑戰越大，視野似乎也就越顯得被侷限在國族主義，甚至是其他的狹隘觀點中。上述學者宣揚了這樣的觀點：在每個人都安全前，沒有人是安全的！■

來信寄至：

Karin Fischer <Karin.fischer@jku.at>

> 人命優先於利潤： 新冠疫情的號角 響起

Kajal Bhardwaj，律師，印度新德里



2021年，於倫敦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製藥業協會辦公室，「立即實現全球正義」和「人民疫苗計劃」為全球疫苗平等而開展活動。

來源：Flickr: [Jess Hurd/Global Justice Now](#)

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WTO）面臨全球受到 HIV 疫情時，遭受多邊協議裡智慧財產權（IP）和TRIPS 協議應的影響。當時，跨國製藥公司指控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允許進口價格合理的治療 HIV 陽性非原廠藥。當這些持有藥物專利的公司需取數萬美元，非原廠的 HIV 藥物每天只花費1 美元。這些公司聲稱南非的行為違反了 TRIPS 協議。因應全球對這些製藥公司的憤怒，WTO 通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和公共衛生的Doha宣言》，這亦確認了各國有權以支持保護公共衛生和所有人皆有權獲得藥物的名義來解釋 TRIPS 協議。

> 新冠疫情和TRIPS障礙

二十年後在新冠疫情下，有三分之二的 WTO 成員要求免除 TRIPS 協議下的知識產權義務。Doha宣言強調的 TRIPS 靈活性——強制許可、平行進口或嚴格的專利標準——幫助各國獲得負擔得起的抗愛滋藥物、C型肝炎、癌症和心臟病治療。但印度和南非目前的提案認為，像 COVID-19 這樣的快速傳播、快速變異的傳染病需要完全免除知識產權的障礙，讓國家和競爭對手可以自由地進行任何 COVID-19 藥物或技術的研究、開發和生產——無需複雜的談判中浪費時間、無需擔心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也無需擔心來自富裕國家的貿易壓力。

正如預期的那樣，富裕國家認為知識產權並沒有製造障礙。但在新冠疫情爆發的一周年之際，證據恰恰相反。儘管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

對 COVID-19 疫苗的不平等分配和搶奪上，但這種不平等從一開始就出現在取得口罩、診斷、設備和治療上。

對於更廣泛的公眾來說，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認識可能來自於新聞，一位從事呼吸器閥門 3D 列印的義大利研究人員可能面臨智慧財產權擁有者的法律訴訟。一位美國參議員要求 3M 這家擁有數百項口罩設計專利的公司放棄其專利以增加口罩供應。法律訴訟的威脅迫使羅氏藥廠公布其在荷蘭進行 COVID-19 試驗的藥物配方。Cepheid 所生產的 45 分鐘 COVID-19 篩檢的價格明明可以由 19.80 美元降低至 5 美元出售，引起了公民團體的譴責。美國跨國公司 MNC Gilead 以 2,340 美元的價格出售抗病毒藥物韋德西韋並以 320 美元為授權費用為少數發展中國家提供服務。利物浦大學的研究人員估計，韋德西韋大規模生產的價格可能低於 6 美元。

當富裕國家平均每秒為一個人接種疫苗時，大多數最貧窮的國家甚至都還未接種過任何一劑。全球南方有相當大的疫苗生產能力，但包括專利、商業秘密和資料獨占權在內的知識產權阻礙了其發展。歐洲專利局的數據顯示，有數百項與新冠病毒疫苗相關的專利。研究表明，疫苗專利往往非常廣泛，涵蓋成分、技術、施用年齡組和劑量。商業秘密保護使疫苗生產商能夠掌握快速擴大生產規模的專有技術。

> 全球南北方治療的差異日趨擴大

根據牛津大學對其 COVID-19 技術的非獨佔知識產權的最初承諾，牛津-AZ 疫苗本應可用於大規模生產。然而，牛津大學 AstraZeneca 公司達成獨家協議之外，AstraZeneca 又再與一些製造商簽定秘密許可條款。AZ 疫苗的生產能力明顯不足，因為印度生產的疫苗逐漸流入一些開發中國家。當初非營利定價的承諾並未兌現，據報導，較貧窮的國家每劑 AZ 疫苗支付 3 美元至 8 美元。

法國、德國和加拿大等富裕國家率先採取法律措施促進 COVID-19 的強制授權。以色列對抗病毒藥物 Lopinavir/Ritonavir 頒發了強制許可。匈牙利和俄羅斯對 Remdesivir 頒發了強制許可。政府消除知識產權壁壘的行動通常導

致公司改變其利用知識產權牟取暴利的行為。以色列對 AbbVie 公司發布的強制許可，導致 Lopinavir/Ritonavir 的專利將不再被 AbbVie 公司壟斷。印度、泰國和阿根廷的病患組織團體已就 Remdesivir 和 Favipiravir 提出解除專利的要求。一家加拿大製造商已公開尋求矯生疫苗的許可，並可能尋求強制許可。

富裕國家已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的公共資金來開發 COVID-19 的疫苗、測試和治療方法。然而，他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並面臨供應中斷。他們沒有消除知識產權的法律壁壘、開放知識共享和增加產量，而是搶購疫苗並實施出口限制。更糟糕的是，那些國家沒有要求公司對其生產能力、價格或協議保持透明。據報導，一些談判甚至觸及要求各國對疫苗的不良反應進行賠償或以大使館等政府資產作為抵押。這些公司拒絕參與世衛組織的技術共享平台或不願意優先提供給 Covax 實施計劃以協助疫苗的公平分配，藥廠組織也正在加強對政府和聯合國機構的遊說力度以規避知識產權壁壘。世衛組織和聯合國機構已公開支持 TRIPS 的專利豁免。但世貿組織秘書處正埋頭苦幹，堅定地繼續推動自願專利豁免。正當這些立場似乎越來越堅定，但在基進主義者為 TRIPS 豁免進行了數月的活動後，美國貿易代表於 2021 年 5 月 5 日意外宣布支持 TRIPS 豁免，儘管僅限於 COVID-19 疫苗。

顯而易見的是，即使美國的舉動將推進 TRIPS 豁免的談判，我們仍浪費了過去一年的時間，等待藥廠做出正確的行動事。應該為普遍大眾提供疫苗的呼聲越來越高。隨著新的 COVID-19 變種病毒出現，國家面臨一波又一波的毀滅性浪潮、死亡與難以消滅的疾病，帶給患者、家庭和衛生系統莫大損失——我們沒有本錢把時間浪費在置利潤於人民之上的複雜貿易規則中。TRIPS 的專利豁免將是清除阻礙所必須的第一步，以確保每個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接觸到所有 COVID-19 的醫療技術。■

來信寄至：

Kajal Bhardwaj <k0b0@yahoo.com>

> COVID-19 疫苗： 揭示全球的不平等現象

Camila Gianel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Cisepa, 秘魯



疫苗分配与大流行之前的全球不平等现象遵循同样的不平等模式。

來源：FrankyDeMeyer/[Getty Images/iStockphoto](#)。

COVID-19正在對全球的經濟和社會產生毀滅性的影響。而在這場全球危機中發出的警示告訴我們，不管身在何處的我們都將面臨著同樣的危機，也就是說我們在同一條船上。這就好比在挪威的卑爾根、秘魯的利馬所面臨的封城。此外，還得應付像是在利馬富裕社區封城時，必須相應封鎖居住在同一城市棚戶區家庭住宅等重大挑戰。

儘管有人呼籲必須要能夠保證各國都能平等地獲得疫苗，但這種同質化(homogenizing)的想像仍導致了 COVID-19 疫苗的分佈不均。真

>>

正的實際情況是富裕國家贏得了這場比賽：它們是首批有能力購買疫苗並開始為國內人口接種疫苗的國家。雖然挪威等一些富裕國家已承諾會與較貧困的國家分享疫苗，但到了 2021 年 1 月，疫苗的獲取量仍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財力。

> 私有化的藥物開發體系

這些我們所看見世界各地難以取得疫苗的情況，並不只是一些吝嗇的特定國家所造成的，在這其中也反映了一個有問題的全球藥物開發體系。事實是，許多富裕國家已撥出公共資金來開發疫苗。即使輝瑞(Pfizer)公司否認有公共資金參與其疫苗的開發，但根據報告顯示，其共同開發疫苗的合作夥伴公司也有獲得公共資金。富裕國家參與疫苗的開發可以使他們能夠要求「更好的疫苗價格」，但我們並不否認私營公司他們從疫苗中獲利的權利。因此，儘管當前急需為南非的人口接種疫苗，以阻止新型變種病毒傳播下去；但根據目前的行情，南非不得不支付幾乎是大多數歐洲國家2.5倍的價格去取得牛津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 COVID-19 疫苗。

公共資金的挹注並沒有限制私人疫苗製造商對保密條款、調整法律上的要求。這些行為保護了製造商，他們仍可以藉此在 COVID-19 疫苗產生意外的副作用時自保。在各國急需疫苗的當前，加上缺乏能夠對 COVID-19 疫苗貿易施加基本條件的全球領導力，使疫苗製造商獲得了龐大的權力。在這之下，疫苗製造商總是不斷地拖延或拒絕與那些需要疫苗的國家進行談判，使這些國家難以在第一時間獲得疫苗，最終導致了大量的死亡，還讓新型變種病毒出現及擴散。

一個談判失敗的例子是秘魯與輝瑞公司。秘魯同時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及全球 COVID-19 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21 年 1 月，當該國才正要開始面臨第二波疫情之時，衛生系統就已經崩潰。早在2020年，秘魯政府就已開始與輝瑞公司談判，但他們拒絕接受該公司所強加的部分非責任條款。因此，儘管 COVID-19 在秘魯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但輝瑞還是將秘魯排在了出貨名單的最後面。這與南非及疫苗價格的情況一樣，他們的做法完全不受懲罰；在全球如此緊急的現況之下，那些能夠強加條款規則，並決定誰可以用什麼價格獲得疫苗的，正是疫苗製造商。

> 取得疫苗、獲得健康人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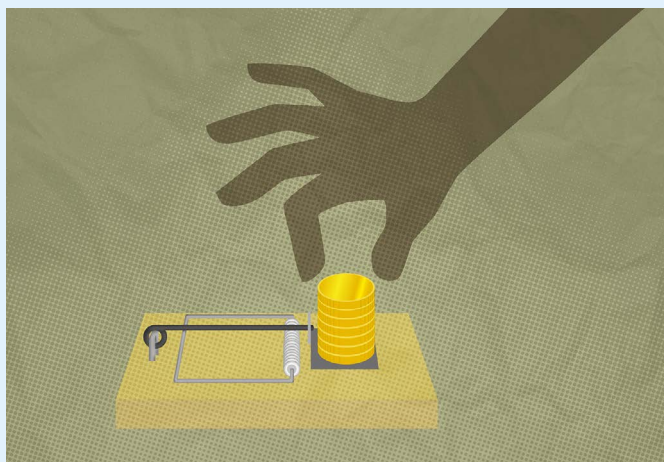
像疫苗這類必需藥品的取得，是實現每個人身心健康權利的基本要素之一。開發藥物和取得開發成果是獲得藥物的關鍵要素。因此，管理取得藥物開發的法律和規定是國家衛生政策的核心要素。COVID-19 的疫情正揭示著我們所缺乏的全球領導力，以及各國難以規範貴重商品製造商的痛處；同時也告訴我們當前醫療開發計劃的局限性。在向私營公司分配公共資金這點上，顯然不足以保證藥品的取得會普及化。■

來信寄至：

Camila Gianella <gianella.c@pucp.edu.pe>

> 持續擴大的債務人 與債權人分野

Christina Laskaridis, The Open University, 英國



| Arbu 繪。

當富裕國家透過債務融資和經濟刺激對抗經濟衰退時，全球南方的中低所得國家正陷入了一場債務陷阱。伴隨著長久以來的國際貸款只促進了債權人的利益而非債務減免，殖民主義的遺毒、以及全球南方因過去主權債務所形塑的地緣政治，都正因COVID-19疫情而有所強化。

> 北方與南方的不平等和全球債務融資

David Graeber 即是其中一個揭露債務如何有效地掩蓋歷史性的依賴與不平等之權力關係的研究者。他指出，在債務的語言中一次又一次重塑的強權關係使處於弱勢地位的人顯得更加有問題。國際貸款作為殖民計畫的一環，使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因償還困難而積累衝突，並導致了特定的境外監督機制和軍隊的介入，然而債務人成功地中止還款並抵抗收債的情況並不少見。近來，新殖民主義與金融化的棱鏡，反射出了國際債務下的全球不平等現象。對於次級金融化趨勢的從屬特點是不平等的債務關係，發展的結構性限制則是來自相較於核心的從屬地位。

與此有關的其中一個面向是和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有關。正如凱因斯以及後凱因斯學派所假設，當國際經濟體系正處在充滿不確定和不穩定的情況，流動性偏好將會最為明顯地反映在金融資產的階序中。有關債務陷阱不斷積累的警告一直到疫情前夕都在持續地增加。美國為因應全球北方危機而實施多年的寬鬆貨幣政策，加上金融業的行動，創造了全球流動性的高峰，卻也對當前的債務危機產生了連鎖反應。這導致了開發中國家在全球的資本競逐，並使得許多低所得和中低所得國家的債權人樣貌產生變化，融資機會和成本變得高度不平等。當國家的融資和再融資能力高度依賴其無法控制的因素時，將構築面對「市場風險」的結構脆弱性，並增加了對商品依賴所引起的外匯波動問題。

債務償還問題是由發展上的限制以及全球生產結構所引起的，它們本身就是殖民歷史的產物，而不是經常聽聞的有關國內公共財政管理不善此一解釋。另一方面則是有關如何解決債務危

>>

機的問題上根深蒂固的制度失靈。當債務償還問題出現時，各國面臨著債權人論壇、異質的法律環境、被資本市場排除在外、以及債權人訴訟的風險，甚至被迫放棄發展計畫。這往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財政緊縮計畫同時出現，這些計畫不能為債務問題提供公平和長期的解決方案，削弱了一個國家保護弱勢人民的能力。眾所周知，債務危機的處理方式的特點是「太少、太晚」，經常無法重建債務的永續性，而債務國也往往需要付出極大的社會代價。

> COVID-19對債務的影響

隨著疫情的爆發，既存的全球經濟不平等現象也被凸顯出來且不斷加劇。伴隨著貿易中斷，也就是各國所仰賴的外匯來源，除了造成由金融市場所決定的主要商品價格下跌之外，2020年春季時資本流動的逆轉更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這導致了各國貨幣的貶值，使償還外匯債務的負擔變得更加嚴重。在危機期間難以取得的強勢貨幣，反映了國際經濟裡的不平等整合與從屬位置，並形塑了不平等的應對能力。這明顯可見於不同的所得群體所獲得的財政援助規模的差異，有權力的行動者所採取的行動也強化了回應流動性需求的不對稱性。

只有某些最強勢的國家可以利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啟動的計畫，擴大美元交換的範圍，而區域性的融資規劃則大多不活躍，使得全球債務問題的主要政策應對來自G20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然而，儘管無條件、無負債的債務融資需要約2.5兆美金，加上約1兆美元跨所得群體的債務豁免，以及早該全面進行的債務結構改革。針對全球債務問題的應對措施，往往依賴於向已經面臨償還債務問題的國家提供跨區域、跨所得群體的高額貸款。其中一些國家已經將大量的公共稅收用於償還債務，甚至比花健康照護上高出好幾倍。G20在2020年4月制定了債務暫緩償還倡議(DSSI)，IMF的貸款和對於雙邊債務償還的暫時推遲，使現有的債務問題惡化，預計將導致未來多年的撙節，同時間接地使不參與的私人和多邊債權人得到償還。債務暫緩償還倡議的自願性意味著債務減免是部分性的，對不參與的債權人是有利的，但代價是昂貴的且遠大於所需的。2020年11月的 The Common Framework，即反映了這些已知的制度失靈。

> 傾斜的國際債務結構

疫情凸顯了現有的國際債務結構長久以來的失能，包括管理債權人群體、預防集體行為產生的問題、保證債權人間的平等，而最重要的是確保迅速、透明、獨立和全面地處理債務償還困難的問題，並最小化債務危機對國家人民的影響。必須回顧一下，現有的方法一直試圖依照債權人的利益來管理債務危機所造成的結果，不斷拒絕中低所得國家提出的方案。這個系統的一個核心要素是世界銀行和IMF的財政緊縮計畫，這些計畫經常對人權產生負面影響，並依賴於將債務定位為「永續的」的貸款審核過程，不僅加劇了債務負擔，也低估了問題的規模，並破壞了所需的救濟。一直以來，隨著某些高所得國家持續經濟刺激的警鈴大響，對全球債務問題的應對預設了成長將回到疫情前的水準，各國將在過渡性的赤字支出後擁抱財政緊縮政策的大流行，放棄投資與所需的社會支出，以縮減政府開支。

我們知道，國際貨幣基金的條件和財政緊縮政策惡化了成長前景，對健康、不平等和貧困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以及償還債務方面的不良記錄。雖然這再現了資金不足、弱化的社會經濟基礎設施，但也強化了這些機構正當性不足的問題。結果再次表明，制度過程強化了國際經濟整合的歷史因素。貸款審核過程正是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權力不平等的徵兆，它突顯了由誰決定什麼可以支付和什麼不能支付的知識政治。使得債權人能夠優先考慮重整債務所需的成本，而非未能重整債務以緩解債務人的處境。■

來信寄至：

Christina Laskaridis

<christina.laskaridis@open.ac.uk>

> 非洲在減少貧窮與不平等上的挑戰

Luckystar Miyandazi, 計畫專員、無國界稅務稽查員及非洲區協調員,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
Africa Financial Sector Hub, 南非

在 2020年3月新冠疫情襲擊全球之前的幾十年,就已經有許多指標指出全球不平等的升溫。基於國籍、年齡、性別、種族、民族或族裔、宗教、經濟、地位和其他面向的差異,COVID-19疫情和其前所未見、對生活各面向的影響,正如我們所見,只會進一步加劇這些多重面向的不平等。

> 貧窮和不平等的倒退

儘管COVID-19的盛行率與死亡率在非洲仍然很低,但非洲大陸仍面臨著挑戰,要從因疫情而惡化的債務和金融危機中復甦。這也侵蝕了非洲先前針對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所做的努力,例如改善醫療保健、食物取得和教育。更重要的是,這也破壞了聯合國所有成員國在2015年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肯認,即要消除貧困就要減少不平等。在洲的層次,《2063年議程》(Agenda 2063)是非洲大陸促進永續和包容的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長程轉型願景,非洲的展望也是將終結貧窮和不平等列為首要項目。因此,不平等與發展和經濟成長高度相連,亦成為全球主要的政策議題。

不幸的是,聯合國的一份報告預測,202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極端貧窮的情況將出現大規模的增長,將有2600萬人因為疫情而落入國際貧窮線以下的生活狀態。此數字是該地區2015年時的貧困水準,意味著其喪失了過去五年的進展。因此,對於非洲來說,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透過在各方面創建一個永續、正義和公平的社會,來改善那些最貧困和最邊緣化的人的生活。

對許多非洲國家而言,經濟不平等—在社會的不同群體間,收入和機會的不平等分配—是最被關注的。即使是國內生產毛額(GDP)最高的非洲國家,如奈及利亞、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安哥拉,也有部分的貧窮或不平等處於最嚴重程度的紀錄。

非洲國家在減少不平等和投資於發展上,面臨兩個另外的挑戰:非法資金流動(IFF)和不斷加劇的債務危機。

> 非法資金流動

IFFs 指透過某些商業行為非法賺取、移轉或使用的資金,如藉由非法空殼公司藏匿公司真正的擁有者;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如偷獵、毒品、武器和人口販運、石油和礦產盜竊;以及促成這些資金外流的重要因素,貪腐。富有的跨國企業、避稅天堂和個人應該為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中多數的非法資金流動負責。某些部門的IFFs集中度較高,特別是採掘業和採礦業,最後往往集中到富裕發達國家或非洲的貿易夥伴。回顧過去二十年,盧安達解密(Luanda Leaks)、模里西斯解密(Mauritius Leaks)、盧森堡洩密(Lux Leaks)、瑞士解密(Swiss Leaks)、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等稅收相關的醜聞層出不窮,揭露出IFFs的問題,並引發大眾和政治上對相關處置的關注。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資訊,非洲因IFFs而造成的損失約為886億美元,相當於其一年GDP的3.7%。這些流出幾乎

>>

「非法資金流動不是一種「無害的犯罪」——它們對個人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與每年非洲國家獲得的官方發展援助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總和一樣多。這顯示了，如果非洲能拿回因 IFFs 而損失的資金並投入非洲大陸的發展，即便沒有外國援助，非洲也仍具有潛力。

在一個已經受苦於缺乏收入的大陸上，這些錢仍正在流失。因此，IFFs 並不是一個「沒有受害者的罪行」——這對個人與社會都有害。這對發展也有明顯的影響，因為這奪走了健康、教育、基礎建設和其他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資金，加劇非洲和全球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程度。

> 惡化的債務

非洲還面臨到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機，由於向外部的公共和私有債權人借款導致的債務問題日益嚴重。因為 COVID-19，有些國家要求取消和減免債務，以協助他們從疫情對健康和經濟的嚴重影響中復甦。

然而，舉例而言，位於內陸並有豐富資源的尚比亞在 2011 年才達到較低的中等收入地位，不斷上升的外債負擔和最近的債務償還違約，被一些公民歸咎於政治精英管理不善、貪腐、缺乏透明度和糟糕的政策回應，這也助長了貧困和不平等。2020 年，尚比亞成為第一個未能償還 4250 萬美元國際債券的非洲國家。尚比亞一直努力掙扎，維持其對其他國家的外債支付，如中國、多邊機構和外部私人債權人，包括貸款與債券。除此之外，COVID-19 壓垮了醫療體系，也加速人類與經濟危機。採礦、農業和觀光等重要的

經濟部門受疫情影響，導致工作流失和失業率增加。由於債務和提供給多國的多重稅收優惠，能投資社會安全網的政策措施的財政空間也受到限制。

> 需要有利於貧窮的稅務政策

國內資源動員 (DRM)，指透過課稅和有利於貧窮的稅收政策，達到在非洲社會和國際上降低經濟不平等的重要措施。

課稅對促進平等能有關鍵的影響力，例如：藉由增加稅收以提供更具需要性的公共物資與服務（如教育、公共醫療）。累進稅率可用於收入和財富的重分配、極大化社會福利，並減少經濟差距。課稅也能作為一種有力的社會手段，調整人們在健康、性別平等和環境上的選擇和行為。課稅同時作為一種代表性和問責性的重要工具，透過較好的稅收分配，資助對窮人有益的公共服務。

明顯地，課稅是達到發展目標的必要資源，並且在減少非洲與全球不平等上扮演重要角色。稅收的角色不應以單一面向理解；它不僅是用於資助對疫情的回應與復甦，更是為了建立更加公正且平等的社會。■

來信寄至：

Luckystar Miyandazi <AzreeStar@gmail.com>

> 印度的雙重災難： 一項未完成的議程

E. Venkat Ramnaya and Viha Emandi, Youth For Action, 印度



環境災難的後果主要影響那些已經遭受大流行病影響的人。例如，印度海德拉巴的奧斯曼尼亞綜合醫院的冠狀病毒患者在2020年由於大雨而被淹沒。

來源：Twitter@UttamTPCC。

即便疫情退去，生活也遠遠稱不上正常。遭遇疫情和洪水雙重災難的印度也證明了人命、生計和財產的損失會更慘。2020年，在COVID-19期間，印度幾個邦面臨大自然的憤怒，暴雨和颶風，導致生計、農作物和人命的喪失。這對數百萬在COVID-19襲來後返回村莊但無法維持生計的移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政府和公民社會組織的救援行動並不足以應對如此巨大的雙重災害。大自然的反撲讓我們應變不及。COVID-19無疑是一場公共衛生災難，並喚起大眾對加強公共衛生投資的關注。但是，從根本上說，疫情本身反映了生態失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生物多樣性的流失和人類侵入自然都加深了COVID-19疫情的爆發和傳播。了解生態學和評估環境變化將是確定未來潛在疫情的關鍵。COVID-19也使得那些支撐起農業、健康和環境的生物科學更加需要被關注。

> 疫情封鎖和移民社群面臨的問題

在印度，弱勢的移民社區，尤其是婦女和兒童不得不面臨多重的心理和經濟壓力。眾所周知，大多數的婦女從事非典型工作。由於封城，當反向移民發生時，大量婦女從城市返回鄉村後在村里找不到任何工作。這導致了女性的抑鬱、絕望和經濟不確定性。疫情封城的同時，據報導，家庭暴力投訴增加了100%，而婦女無法從社會機構那裏獲得任何社會援助。由於他們不熟悉智慧型手機以及缺少政府支持，難以聯繫原生家庭，導致女性焦慮和自殺增加。有大量的少女和年輕女性撥打1098，一個兒童求助熱線支持中心，旨在保護他們免受身心虐待。健保機構無法解決除了COVID-19以外的問題，貧困婦女不得已只能靠自己，在治療和生產小孩上花費大量金錢。由於政府救濟金和物資不足，學校關閉也就意味著兒童無法獲得學校午餐，因此婦女和兒童的營養不良現象也十分普遍。部分家庭承受顯而易見的飢餓，缺乏就業導致他們為生存而耗盡微薄儲蓄。

>>

> 洪水

即使在像海得拉巴這樣的城市地區，貧民窟和小型定居點的弱勢人口也不得不在洪水湧入時放棄家園。這些貧困社區的許多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用品，不得不暫時搬到新的地方，承受著巨大的生理、心理和經濟壓力。洪水是政策規劃錯誤的結果，在排水渠和儲水區進行建設的後果就是進一步降低了城市環境的負載力。此外，從2014年起在印度發生的一系列颶風和洪水是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為排放，以及國家缺乏規劃的發展活動所造成的結果例如，2014年8月比哈爾邦東部的Kosi河發生大洪水，這是由於河流發源地尼泊爾的暴雨以及那裡釋放每秒兩千八百萬立方公尺的水所造成的結果。Kosi河沿岸的洪水影響了大約225,000人，他們失去了生命、作物、牲畜和財產。

> 政府必須行動

現在是決策者認清氣候變遷的現狀，並共同努力恢復生態環境的時候了。我們希望美國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對此做出新的承諾。在2020年11月舉行的第十五屆G-20峰會上，印度總理呼籲為後疫情世界制定一個新的全球指數，其中將強調在大地之母委託管理的精神下尊重自然。峰會另一個目標是創建龐大的人才庫，確保技術覆蓋社會的所有層面，並且更重要的是治理的透明。以18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為成員的抗災基礎設施聯盟 (Coalition for Disaster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CDRI) 的成立將給予自然災害期間的基礎設施破壞至今尚未受到的重視。這對於受災影響過大的貧國在拯救生命和生計上尤為重要。

制定全球政策可能需要時間，但印度的未來應該是重新定義「貧窮線」的概念，並努力實現賦權指數。賦權指數將包括滿足八項基本需求：醫療保健、衛生、住房、基本營養、潔淨能源、教育、安全飲用水和社會安全。企業部門必須支持政府實現這些基本需求，而非急於贏得疫苗合約；應致力於實現永續發展以產生高品質的成果，使獲得疫苗成為弱勢群體的首要權利。企業必須採用企業社會責任 (CSR) 基金來加強醫療基礎設施、疫苗的獲取以及面對COVID-19和氣候變化的行動。印度政府必須將其衛生預算從目前佔GDP的1%提高到至少5%，以應對後疫情的醫療挑戰。用我們組織中自助團體的女性成員的話來說，政府必須為她們提供一個安全的生活場所、能更好地滿足基本需求、並啟動應急措施以滿足她們當前的基本必需品。■

來信寄至：

E. Venkat Ramnayya <vedvon@yahoo.co.in>

Viha Emandi <viha.emandi@gmail.com>

> 基礎經濟作為社會改革的關鍵

Julie Froud,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英國, 為 Foundational Economy Collective 所寫



人們經常對所謂的「必須勞動者」表達感激，然而他們大多數人薪水卻很低、在不穩定的情況下工作，並面臨 COVID-19 帶來的勞動新風險。

來源：[Flickr/創用CC](#)。

當今的疫情強烈地提醒人們基礎經濟的重要性——也就是那些每天不斷被消耗、並使安全和文明生活成為可能的商品及服務。其中包括管線、電纜網絡等基礎設施，傳遞了公用事業、通信、交通運輸和食品供應，以及及時的(providential)¹服務如保健、照護、教育和收入支持等²。人們傾向視這些為理所當然，低估了服務本身和提供服務的工人的價值，直到嚴重的中斷造成生活不便或重大威脅。在 COVID-19 期間，許多公民意識到食品分配系統的岌岌可危，就像斷電和乾旱提醒了我們對持續供電和供水的依賴一樣。疫情帶給我們「關鍵工人(key workers)」或「重要工人(essential workers)」一詞，也就是那些在危機期間繼續「上班」以確保日常基礎設施得到維護的人。同時很明顯地，這些重要工人中許多薪水極低、處境艱難危險，並面臨COVID-19帶來的全新職業風險。

除了及時提點基礎經濟的關鍵性質之外，這場危機還強調了集體組織、供應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消費的重要性。即便是高所得者，仍然得依賴交通系統的品質或醫院的加護病房；個人的高收入並不能確保良好的 Wi-Fi 訊號，也不能保證乾淨的空氣品質或優良的公園。同理，我們的個人安全取決於疫情期間，全球醫療服務的品質和範圍。所有這些都放大了經濟進步衡量標準(例如人均 GDP)的限制，其未能掌控股構成美好生活的不同價值，且經常沒有充分凸顯重要工作的意義。

> 供應和基礎設施的革新

為了認知到這些物質和及時服務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對當前提供的機會進行清晰、徹底

的思考。簡言之，眼前所呈現的是一個雙重挑戰，我們要透過政策和政治關注，同時保護現今、未來兩個世代的福祉。許多國家甚至在 COVID-19 來襲之前就已經暴露了基礎服務供應的不足，原因來自於投資不足、私有化、市場化和金融化的共同集合。崩潰中的基礎設施、處在高齡化社會卻欠缺資金的照護工作、「食物沙漠」，也就是都市公民無法輕易獲得優質且新鮮的食品：這些都是基礎設施供應失敗的例子，在這些方面著手改善將提高公民的福祉。

大多數情況下，為當前世代的福祉打從基礎進行改革，需要借助額外的財務來源，包含資本和收益。即便是在德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交通和教育端的基礎設施惡化同樣引起了激烈討論。然而，光憑投資本身無法解決組織並提供服務時所遭遇到的問題，這代表改革還需要兼顧重組經常功能失調的商業模式。舉例來說，缺乏資金的照護體系需要更多資源，以滿足人數逐漸成長的老年、弱勢群體，其健康和社會需求。然而，如果照護的供給者來自私募股權或其他榨取式經營的所有權，那額外的資源就可能被導向更高的利潤，而非用於僱用更多的員工或改善照護品質。或者，將照護交由大型官僚機構組織，同時接受照護者的投入很少，則額外資源應結合改革，以實現在地化提供，並賦予利害關係人更多發言權。大多數情況下，為當前世代的福祉打從基礎進行改革，需要借助額外的財務來源，包含資本和收益。即便是在德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交通和教育端的基礎設施惡化同樣引起了激烈討論。然而，光憑投資本身無法解決組織並提供服務時所遭遇到的問題，這代表改革還需要兼顧重組經常功能失調的商業模式。舉例來說，缺乏資金的照護體系需要更多資源，以滿足人數逐漸成長的老年、弱勢群體，其健康和社會需求。然而，如果照護的供給者來自私募股權或其他榨取式經營的所有權，那額外的資源就可能被導向更高的利潤，而非用於僱用更多的員工或改善照護品質。或者，將照護交由大型官僚機構組織，同時接受照護者的投入很少，則額外資源應結合改革，以實現在地化提供，並賦予利害關係人更多發言權。

在重建基礎設施和服務以改善公民服務的同時，基礎改革所面臨的政治挑戰還包含應付氣候和自然危機，以便留下福祉給未來世代³。例如，要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就需要來自住房、交通、食品等基礎經濟活動的重大貢獻⁴。有鑑於這

些活動是不可或缺的，減少排放不會來自於節制使用，而是來自新的法規和行為轉變所催生而成的生產、消費變化。這可能包括不同的建築技術、改造現有建築以節省能源、改變所消費的食物成分，並以人力旅行和大眾運輸工具替代私人交通工具。

> 國家的明確角色

國家在這些改革過程中扮演著明確的角色。不僅許多基礎服務在某種程度上皆由國家提供和/或資助，而且通過獲得這些日常生活基礎設施而實現的社會公民身份，也需要一個負責、反應迅速的國家。許多原本的基礎設施，如供水和污水系統、電網或公立醫院，都是通過從上而下的規劃和工程所實現的。改革和提供新的基礎設施也需要提供更強力的角色給公民參與，特別是在需要權衡、取捨的情況下（如應對氣候變遷或預算考量），或者當社區和在地組織的專業知識已經了解如何改善社會成果的情況，如公共保健方面。

基礎經濟的改革也是推動其他政策如全民基本收入或普及基本服務的重要前提。簡單地向公民提供現金並不能確保福祉，因為生活品質取決於能否取得集體提供的服務，例如醫療保健、寬頻、社會住宅、融合且可負擔的大眾運輸，以及綠色空間。如果說疫情有留下什麼具有意義的遺產，它應該包括基礎經濟的改革，以社會和生態永續的方式，提高現今的宜居性。■

來信寄至：

Julie Froud <julie.froud@manchester.ac.uk>

1. 此處使用「及時的」一詞意指未雨綢繆、超前部屬 (provident)，以提供未來的需求。這個詞呼應了天賜社會 (providential societies)，其建立是為了讓人們能為未來的疾病等費用預先儲蓄。本術語涵蓋公共和福利服務。
2. 更多資訊請參見：<https://foundationaleconomy.com/introduction/>
3. 更多資訊請參見：<https://foundationaleconomy.com.files.wordpress.com/2021/01/fe-wp8-meeting-social-needs-on-a-damaged-planet.pdf>
4. 例如，斯德哥爾摩研究所 (Stockholm Institute) 估計威爾斯 59% 的生態足跡可歸因於食物 (28%)、住房 (20%) 和交通 (11%) 的消費 <https://gov.wales/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9-04/ecological-and-carbon-footprint-of-wales-report.pdf>

> 適合未來的經濟和國家制度

Andreas Novy 和 Richard Bärnthaler,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奧地利

所 有人都知道，我們目前生在劇烈動盪的時代。問題不再是二十一世紀「是否」會發生重大的變化，而是這種轉變將會「如何」發生——如同我們目前面對疫情所經歷的一樣，以混亂的方式發生，或是集體塑造而成。後者取決於兩個先決條件：重新思考經濟學，以及加強公共和民主機構。

> 二十世紀經濟思想的局限

在過去幾十年裡，已經在19世紀佔據主導地位的市場自由主義觀點，經歷了一次復興。經常被批評為新自由主義的它，早已滲透到政治思想中，影響遠遠超出了右翼政策制定的範圍。市場在提高(生態)效率、完善稀有資源配置方面的優勢，已經成為一種教條，約束著歐盟和美國的主流觀點。然而，更完善的市場並不足以使我們保持在地球的界限之內——不僅因為綠色成長(在經濟成長與環境壓力沒有絕對脫鉤的情況下，實際上根本不是綠色的)傾向藉由增加消費量來抵消所獲得的效率，還因為市場自由主義忽略了佔優勢卻無法延續的慣例、做法和習慣。它秉持著近乎宗教似的信仰，相信資訊透明、理性的消費者有能力透過個人市場選擇「解決」氣候危機。這種市場優先的解決方案不僅加劇了消費機會不均衡，還對民主構成了威脅。在市場自由主義中，國家既不軟弱也不侷限於自由放任，而是具備強大的授權來強制執行合約和保護私有財產權。然而，在這個產權集中於財團企業內部的世界中，市場自由主義國家產生了新的、不民主、高度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跨國公司已成為全球規則制定者和決策者，能夠將成本外部化到社會和環境上，並將這種外部化轉變為私有的股東價值。

二戰以後，無論是在世界北方，還是世界南方的發展型國家，都出現了立基於福利資本主義的「戰後共識(post-war consensus)」。基礎設施供應被視為公家當局的一項基本任務：從獲得

健康和教育，到能源、住房、流動性供應的顯著市政化或國有化。更大範圍的工具——對宏觀經濟的干預、對市場範圍限制和再分配措施——造成了多元化的經濟制度，促進了西歐和北美的繁榮以及全球南方的國家發展。雖然在20世紀末，這種經濟共識在學術界和政策制定端遭遇到嚴重挫折，它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重新獲得影響力。21世紀版本的福利資本主義反映了社會—生態系統轉型的務實途徑，促進生態現代化，並認可國家在創新和產業政策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忽略了利潤和增長的急迫性，以及消費主義如何構成我們生產和生活的方式。結果，不平等依然嚴重，氣候災難也升級。更驚人的是，由領土所組織而成的「福利和管制型國家(welfare and regulatory state)」，其效力已經被日益去領土化的經濟削弱，使跨國公司能夠逃避國家立法並集中財富。

> 一個新興框架

有鑑於不斷升溫的危機，第三種經濟思想開始浮現。它吸收了馬克思、凱因斯、布勞岱爾、女性主義經濟學和基礎經濟集體(Foundational Economy Collective)的見解，以區別：(1) 日常活動的基礎經濟領域，包括生存和在地供應，以及免費的照護工作；(2) 可創造價值的市場經濟，包含非必要的本地供應和出口導向的活動；(3) 價值接收的食利人經濟(rentier economy)。Karl Polanyi的觀點，將經濟理解為一種組織生計的系統，最適合用來應對社會—生態系統轉型的挑戰，強調擴大和強化基礎經濟(第一優先)和非必要的地方供應(第二要務)、轉變出口導向的市場經濟、縮小食利人經濟。

當我們認知到地球上所有人的美好生活只能透過後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模式的轉型來實現時，這種途徑卻缺乏以民主手段引入必要改變

>>

「加強適合未來的經濟的有效戰略，需要通過有選擇的經濟去全球化，為各種糾纏在一起但適當的政策空間賦權，並追求相關的領土化自決形式。」

的策略。一些支持者傾向抗拒國家和權貴的草根運動和公民社會行動主義，從而強化了市場自由主義中的反國家主義和政治宿命論，並將過去幾十年的主流後政治決策與國家機構混為一談。然而，一連串威權政府的崛起，展示了國家機構的潛在力量。儘管它們當中，無論是在當代的巴西、印度還是中國，都不是適當的模型，但它們紛紛展現了國家與生俱來的潛力，也就是作為具有領土化主權的邊界管轄實體：例如內政「國家」(municipal-state)、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歐洲「國家」(European-state)。忽視國家有可能對合法的規則制定進行壟斷，不只天真和危險，尤其是犧牲了對抗霸權的潛在籌碼，並依然深陷於利基遊戲(niche-games)之中。

> 非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必要性

一個強化經濟、使它更適合未來的有效策略，需要透過選擇性的經濟去全球化，賦權給多種相互糾纏但適當的政策空間，從而追求相互關聯的領土化形式自決，例如城市、區域、國家等。國家透過公共和民主機構管理一片領土，既不能限縮為「民族」國家，也不能淪為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創新的國家形式需要更加地分散，賦權並保護中間的媒介機構和自我管理的、非商品化的工作和生活範圍。然而，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強調這種進步的國家機構在資本主義下的侷限，堅持認為在資本主義之下，國家就是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同意，一個公共和民主的國家機構只能在資本主義以外的經濟體系中蓬勃發展。然而，由於非資本主義領域一直存在於資本主義「之中」，非資本主義國家機構也可以存在於資本

主義之中：例如合作社、市政公司和公共退休金體系。由於資本主義依賴基礎經濟領域（尤其是照護和基礎設施），非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實則維繫了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和效力。因為資本主義依賴它自身的否定，國家機構可以強化基礎經濟區域，使所有居民都能享有文明的生活。可以將負擔得起的集體供應系統（照護、健康、教育、住宅、流動性）進行結合，並排除無法永續的選項（如：禁止短途飛行）和將投資轉向可持續的經濟活動（如：通過補貼、直接投資、稅收、社會許可經營、再培訓計劃）以確保社會生態系統的普遍性。短期而言，這是可以走出新自由主義、加強資本主義內綠色、非資本主義國家形式的可行策略。

然而長遠來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地球上所有人的美好生活仍然不相容。因此，為了走出資本主義，新的國家形式必須圍繞著去商品化的生活領域，「超越」它們原先資本再生產的功能，繁榮地發展。這可能造成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係轉型，基礎設施供應的投資和營運將變得更加社會化，並降低對勞動市場所得的依賴。促進福祉將製造更多的空閒時間，而非提高薪資，獲得公共物品將比擁有私人物品更受重視，降低生活成本（例如：負擔得起的公共基礎設施和住宅）將優先於提高購買力。■

來信寄至：

Andreas Novy <Andreas.novy@wu.ac.at>

Richard Bärnthaler <richard.baernthaler@wu.ac.at>

> COVID-19: 國家和經濟的新接合

Bob Jessop,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國

COVID-19疫情的嚴重性仍持續者。若未能消除病毒，在疫情被控制之前，我們不會知道什麼是最有效的回應方式。然後很明顯地，有些國家在控制病例和減少額外死亡上更為成功。同樣明顯地，疫情為國家介入互助行動和支持私人企業上提供了新的理由。本文將探討疫情的這個面向。

此次疫情可被視為全球危機。危機往往會擾亂公認的世界觀以及如何在其中「繼續」運作，從而質疑理論、政策典範和日常慣例。儘管疫情長期被視為潛在威脅，COVID-19危機在最開始也是很大程度被建構為外來的、威脅人類的意外衝擊。這反映在保護人類安全生命政治論述，以及針對內在威脅（如：移工、吉普賽人）的激進論述。另一方面，疫情危機也可以被追溯到農業資本化侵襲大自然，並創造了病毒自動物傳染給人類的條件。COVID-19的擴散也反應全球貿易和國際移動的興盛，讓病毒更容易在國家間、大洲間移動。儘管如此，疫情發生率不是均勻分布的：不同政治體制對其有不同的理解、有些著重生命政治的安全、防禦內部敵人的問題、或者是經濟議題比健康議題更重要。

> 對英國應對失當的解釋

本文聚焦於歐洲和北美，這些地區抗疫上的表現不佳可能來自於一種策略，使政體更直接、更持續的臣服於「全球化的必要性」這種新自由主義論述。這種策略將社會的「脆弱性」視為一種規範的工具，加強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並伴隨著財富不平等和惡化階級分化。這也加速了體制的轉變，從共享公民權的福利國家到強制的工作福利體制，特別是美國——如果不服從規範有被監禁的可能性。新自由主義賦予市場特權並借以國家力量擴張。相反的，COVID-19使國家成為關

鍵的行動者，包括公司協力、無條件的團結（互助行動）和復甦互助的社會。

英國是個新自由主義政治體制，其組織碎裂、去中心化，且缺乏整體公、私部門的協調，使該國對疫情缺乏準備。政府也分心於執行脫歐的需求，且有一個只顧民調民調首相。也就是說，英國公衛系統對疫情的準備不足。從2009年到2018年，健保相關預算的人均支出下降1.2%，與健保需求的增長並不相符。人力短缺包括護理師4萬多人、普通科醫生2,500人、住院醫師9,000人，加護病房的設備也不充足。

過去政府準備的疫情因應策略是一張技術官僚的藍圖，它並未思考到健康和社會照護基礎建設惡劣的情況，包括呼吸器、個人防護設備，以及工人與邊緣族群的脆弱性。回顧2011年的流感因應計畫（Influenza Pandemic Preparedness Strategy），英國政府的政策「依循科學」，就和緊急情況科學建議小組所提的相同。科學家錯誤地將本次疫情跟流感類比，並預估疫情將造成25萬的額外死亡，且透過分類來處理病患（允許老年人死亡、將病人分散到照護機構）。當民意拒絕這種策略，政府嘗試穩定感染數以延緩病毒的擴散，隨後將中央權力下放和建立封城的層級，而這通常為時已晚。確實，低病假工資意味著經濟不穩定者即便身體不適也會選擇繼續工作。這導致了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

英國政府未能有效地建立「篩檢-追蹤-隔離」的系統，且因為對私部門運作的一味信任，他們沒有將地方服務和國家機構連成一致的因應措施。除了從特定國家返國的旅客，沒有針對隔離或檢疫者進行系統性地追蹤。英國的社區篩檢是在NHS（英國國民健保署）的架構外運作的，並沒有像德國、愛爾蘭、南韓等其他國家有良好

>>

「這場大流行為國家干預提供了新的理由，以互助和支持私營企業為導向。」

的醫療監督。然而藉由公衛服務，疫苗接種政策則是被妥善地處理。

英國在應對 COVID-19 時將財富置於健康之上，結果適得其反。事實上，保衛健康也能更有效的保護經濟。在美國、英國、瑞典和巴西，政府最初拒絕重視COVID-19的致命性並保護生命。讓(大)企業持續運作更為重要。這造成延遲封城和社會隔離措施，隨後「輕度」封城並無法抑制病毒；接著，太早解封也導致疫情再起。

> 國家強勢行動的成功

雖然 COVID-19 是全球疫情，但與科學家相比，政治人物之間幾乎沒有一致的應對措施。相反，疫情和疫苗國族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存在，且幾乎沒有在協調全球疫苗接種上

投注努力與金錢。這在全球北方尤為明顯，他們清楚疫情會影響全球南方。然而，不論是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島國或大陸國家、儒教國家或佛教國家、社群主義或個人主義，東亞、東南亞和澳洲國家比起歐洲、美洲國家在COVID-19的控管上做得更好。以強力的國家行動和公共衛生措施推動，紐西蘭、新加坡、越南、台灣和澳洲採取的「清零」政策奏效，比起容忍死亡、逐步增強免疫力、廣泛疫苗施打政策的群體免疫政策更為有效。我們可以預期，後COVID-19的探詢將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因應方式，並建議適當、良好的投資於公共衛生和照護基礎建設，並大力支持有效的國家行動。■

來信寄至：

Bob Jessop <b.jessop@lancaster.ac.uk>

> 利維坦回來了！ 疫情國家與社會學

Klaus Dörre 和 Walid Ibrahim · 德國耶拿大學



德國埃爾富特的疫苗中心。這是「疫情國家」的照護面向，還是必要的經濟復甦措施？
來源：Walid Ibrahim。

我們可以如此總結現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世界情勢：「利維坦」回來了！在 Thomas Hobbes 的開創性著作《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權力》中，他選擇了海怪的比喻來表達現代國家的矛盾本質。在現下的新自由主義時期，這頭海怪看起來正在退縮，但事實絕非如此，因為即使在智利，也只有一个專制國家才使得「芝加哥男孩」的市場激進實驗成為可能。然而，社會學式的社會批判首先意味著市場的批判。在此背景下，Karl Polanyi 能夠成為一種雙重運動——這種運動一上來就等同於對市場的深遠脫離——的學術見證人，絕非巧合。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突發以來，鐘擺已經往回擺動：利維坦干預著——作為對抗疫情的緊急狀態國家，同時作為一個在諸國家和地區投資了無數資金以保護並在必要時重建經濟的干預主義國家。

> 對「新冠國家」的評估

該如何評估這樣一個國家？系統理論家惱怒了，因為他們本來已經剔除國家行動者對所有社會子系統的有效干預的可能性；凱恩斯主義則因為國家債務現已成為刺激經濟的一種可選擇的手段而感到喜悅；再者，自由派記者卻為那在「新冠國家」無數次的封鎖和閉關中被加以懸置的「基本權利」感到擔憂。那麼，我們該如何評估這一干預主義國家？作為初步的答案，我們大膽地提出如下論點：國家干預主義將成為「帶著全新面孔的資本主義」的助產士。無論如何，就「新冠國家」以兩種從根底上不同變樣而卻又鬆軟地連結在一起的國家行動同時回應疫情和經濟衰退來說，它誠然是個混合物：新冠疫情正應付以緊急狀態，這種緊急狀態一方面是在憲法框架內運作的，而另一方面卻由於暫時性地懸置了基本權利而凌駕於憲法之上。國家「例外狀態」的惟一正當

>>

性在於對抗疫情，它執行具有約束力的社交距離以避免病毒的迅速傳播，這種做法自然是在應對醫療災難，然而，隨著疫情逐漸可控，這種做法將失去其正當性。所有被特定分析者所歡迎的例外狀態傾向，包括減緩日常生活的步調、放棄消費、避免旅遊、花時間照顧自己和他人等等，被認為在疫情結束以後只能以自願的形式持續。恢復前疫情自然狀態的那種顯而易見的衝動暗示此類分析如何與現實脫節。

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評估這樣的經濟干預主義國家。逐漸擺脫財政緊縮、平衡預算、「黑零政策」(Schwarze Null)，以及(迄今為止僅暗示)對巨額資產及高收入的更高的稅收，相較於早期的市場激進主義更顯進步。話雖如此，疫情國家並不保證能夠滿足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社會-生態轉型。就政治-經濟的層次而言，它如履薄冰，因為即便是在富裕的國家，高昂的公共債務也只有中央銀行和金融市場彼此配合並保證低利率政策的情況下才能運作。這只是導致情況愈發嚴重：我們看到那些負有債責的國家機具大多以缺乏經濟和產業政策的想像力呈現自身。由於拋棄了謹慎的干預主義，對於如何處理透過投資或重建計劃所獲得的意外之財，它們所知甚少。

> 經濟干預的界限

由於上述緣故，或許不該再對疫情國家的生態永續效果抱以過高期待。干預主義經濟國家旨在直接地抵消經濟活動的收縮。債務通融重建計劃的正當性是以增長的效度來測量的。以這種觀點來看，疫情國家乃是一種矛盾的存在。經濟干預主義國家是要倒出其不平等的孿生兄弟——疫情緊急國家——為它煮的湯。在這個過程中，生態永續的目標自然要被擱置在一旁。

氣候變遷在此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教訓。新冠疫情只有乍看之下才是具有生態效益的。正如2007年的衝擊，封鎖和經濟危機導致了「因災難而退化」。沒錯，受限的流動和暫時性的工業崩潰是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到幾十年內未有過的程度。然而隨著經濟的復甦，排放量卻攀升

得比預期的還要快。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計算，證實2020年前三個月的全球排放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八，這相當於原來整個歐洲的排放量。但是自2020年四月以來，全球排放量在此攀升；到了十二月，全球排放量已經高於去年同期的水平。為了實現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認為仍合理可控的1.5度全球暖化方案，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以平均每年7.6的百分率減少——但這只有持續地進行而不是在暫時性的封鎖方有可能。國際能源署擔心，2019年達到全球排放峰值的歷史性機會正在被浪費。作為高債務水平和稅收減少的結果，所有社會面臨著的艱難的分配鬥爭，可能會進一步加劇這一趨勢。

最後，必須注意到儘管干預主義國家是個利維坦，但這個怪物卻有可能帶來有益的影響：它保護自己的國民，置人類生命於經濟利益之上。當然，作為另一面，它使對疫情的對抗成為帝國對抗的對象。惟有那些擁有足夠疫苗並迅速地執行疫苗接種的國家才具有快速的經濟復甦機會。作為結果，全球健康威脅勢必與疫苗民族主義進行鬥爭。儘管已經發出過許多團結性的聲援，截至2021年春天為止，僅有十個國家獲得了足足百分之七十六的可用疫苗，而多達八十五個低收入國家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開始對其人口進行疫苗接種。由此將增加對疫苗具有抗性的突變的風險。眾所周知，資本主義-支配的國家體系無法將疫苗視為一種公益善舉並協助實現人人享有健康保護的永續目標(SDG 3)。因此，以其主要的運作形式來看，疫情國家並非社會和環境永續進步的保證。對社會學分析及其批判來說，上述種種指向了重新界定社會學自己的主題的需要：國家必須再次成為社會學專業知識的焦點。為了如實地評估疫情國家究竟何謂及其如何運作，我們需要大量的、全球性的、跨學科的研究計劃。如今正是國際社會學界快速且果斷地觸及這些任務的時刻。■

來信寄至：

Klaus Dörre <klaus.doerre@uni-jena.de>
Walid Ibrahim <walid.ibrahim@uni-jena.de>

1. 「黑零政策」指的是一種平衡的預算。

> COVID-19：德國不安全地區的形成

Daniel Mullis,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PRIF), 德國



廢棄生產大廳。
來源：Daniel Mullis。

Rosemary-Claire Collard 定義了生命政治的計算，他主張這是「精確的掌握誰或哪些生命受到監管或確保安全」。延續 Michel Foucault，生命政治即關注人口福祉的政治學。也就是擁有「讓人活著」和「讓人死」的能力。Matthew Hannah、Jan Simon Hutta 和 Christoph Schemann 認為，國家對 COVID-19 的回應「從生命政治的角度來說是合理的，藉由『再生物化』人口，以及盡可能讓最多人存活做為首要目標。但顯然有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重要。在世界各地，COVID-19 的感染程度隨著階級、種族和性別的邊緣化而上升。疫情具有顯著的地理性，揭示了社會中被忽視的部分，那些國家不願意保護的地方。我將藉由德國政府選擇介入/不介入的相關資料來闡明這個論點。

>外圍化

「病毒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城市和社會外圍的地方。」Samantha Biglieri、Lorenzo De Vidovich 和 Roger Keil 這樣主張。早先在2021年1月的談話中，Roger Keil 便已提出三種相關的外圍化模式：空間外圍化指不在當代社會中心位置的空間；制度性外圍化來自國家主導的措施，以將人們推向邊緣的方式組織社會；以及社會外圍化涉及激進的社會分歧——我將藉由在種族中加入階級與性別面向來擴展這個觀點。

關於COVID-19在德國的地理分佈，Robert Koch 研究院表示，在2020、2021年間的冬天，高社經剝奪區域的死亡率較低社經剝奪區域高出約50%至70%。根據柏林、布萊梅或科隆等都市地區的數據，疫情對人口密度高、平均收入較低、貧困率較高的地區帶來較嚴重的衝擊。當討論國家介入/不介入時，制度性外圍化是三種模式中最有意義的。舉例來說，在貧困和空間外圍化的形成中，這尤為明顯。

>>

關於第一個例子，貧窮問題在德國是個不爭的事實，在經歷德國基於《議程2010》進行的福利制度改革後，貧窮議題更為顯著了。除此之外，低工資部門實施，基本社會扶助也改組。貧窮並不是自然存在的：這是不正義的經濟體制生產/再生產的，並且有法律和國家權力的協助。後果顯而易見。數據顯示，與社會中更富裕的階層相比，依賴基本社會扶助的人遭受 COVID-19 的影響要大得多。長期失業者接受住院治療的比率幾乎是在職者的兩倍。缺乏經濟資源的人生活在更加擁擠或狹窄的環境中，經常是被邊緣化而住在社會住宅；他們在不穩定的處境下工作；他們也缺乏數位基礎建設，使得在家線上學習難以進行。這些都加深他們的脆弱性和社會分歧。在疫情期間，不富裕的人失去了收入，中產階級維持他們的地位，而超級富有的人更加富有了。

討論的第二個例子——空間外圍性的生產——這是一個從社會中心位置發生的政治過程。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原則下的政治決策創造了核心和邊垂。結果包括將他們排除在社會住宅、難民營、無家者收容所、療養院，以及發配於不穩定的工作狀態。在疫情期間，這些社會配置都成為德國的 COVID-19 熱區。於此同時，為了將疫情與主流社會區隔，在政治話語中，特別是住宅區和都市區被描繪成危險的地方。這種策略往往出現在有關貧民區的討論中。首先將疫情空間化，然後將部分空間標記為「移民」、「貧窮」、「不守規矩的」等，從而得出結論，該空間及其居民才是真正的問題。

> 中心性

顯而易見的是，製造安全/不安全的空間是有權力者採用的政治過程。Foucault 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化進程中，政治經濟學成為政府決策的理據。Wendy Brown 補充說：「國家的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而國家的正當性與經濟成長息息相關。」德國管控 COVID-19 的措施遵循了這個原則。根據現有數據，只有 12.8% 的附加價值毛額是受到與疫情相關的限制的直接影響：這些影響最主要在零售、餐飲、教育、旅遊、休閒以及文化產業中。其他 87.2% 的經濟繼續運作著，影響並不顯著。並沒有任何措施是試圖暫停經濟活動以保護危殆勞工於染疫風險中。

那麼，外圍空間的大規模爆發也呈現了中心性。這可以為屠宰場、物流中心和學校的高感染率提出理由。肉品工業是德國重要的出口導向部門，其生產不能停滯。在物流中心的案例中，一位來自波蘭波茲南市的 Amazon 員工 Agnieszka Mróz 尖銳地指出，她說她和她的同事不是受害者，而是那些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工作，對商品物流通暢至關重要的人們。就學校的面向來看，很明顯地，儘管有許多關於兒童權利的討論，但兒童在疫情期間從來沒有被重視。開放學校主要是為了讓家長成為可用的勞動力，而不是為了教育的正義。

> 國家(不)干預主義的模式

COVID-19 標誌出多重的空間、制度性和社會外圍，這些是病毒和社會效果產生最多負面影響的地方。社會經濟剝奪使人們面臨致命的風險和貧窮。關於國家干預主義，重要的是要強調威權和安全導向的路徑，也是大多數政府在對抗病毒所選擇的，而不是將人民納入基於團結和正義而限制自由的民主過程中。同時，也應更仔細地分析國家在哪些方面選擇不採取行動和不讓哪些地方安全。相反地，政治決策加深了分化、邊緣化和外圍化的模式，沿著階級、種族和性別的面向，從那些被邊緣化的人中區隔，以保護「人民」。

來信寄至：

Daniel Mullis <mullis@hsfk.de>

> 憂鬱之後：後新自由主義方案

Arthur Bueno,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德國, 以及 ISA 概念與語句分析 (RC35) 研究委員會成員



二十一世紀的轉向主要發生在憂鬱症的標誌下，主要表現為疲憊、空虛和無法行動的感覺。

來源：Ehimetalor Akhere Unuabona 於 Unsplash。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變動的時代。從2008年的經濟大蕭條到近年來興起的政治抗爭、從新右派崛起到疫情的衝擊，一系列的徵兆預示著我們正身處歷史的交叉口：舊的世界正在死亡，而另一個世界尚未誕生。這些過程帶來的新挑戰，不只建立了一些社會制度，也影響了離我們最近的事物——使我們數十年來習慣於感受、思考和行動的方式進入耗竭。我們面臨的危機是關於主體性的。如果不考慮後者的結構與其目前的轉變，我們便無法適切地評估其帶來的危險與潛力。但是我們應該如何描述這個正處於危機當中的主體呢？

> 主體的企業化憂鬱

二十一世紀的轉向，主要是以憂鬱症為標誌。當時的心理痛苦，似乎不再以弗洛伊德時期的經典精神官能症症狀為主要表現，而是疲憊、空虛和無法行動的感覺。弗洛伊德的精神官能症是一種內疚的疾病，在這種疾病裡，主體會感覺自己在那些被允許的和不被允許的事項之間，以及法律權威和被壓抑的驅動力之間掙扎。相較之

下，憂鬱症則可以被描述為一個關於「不夠好」的疾病；在此疾病中，雖然沒有不被允許的事情，但是人們會感覺自己永遠沒有辦法真正達成自己可能達成的事情。一個人之所以變得憂鬱，是因為其必須承受「一切皆可實現」的幻覺：被困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間，在無限的可及性，以及一個人真正能完成的事情之間，憂鬱症患者只是「無力的人」。

從精神官能症到憂鬱症的臨床診斷轉向，不僅與特定的受苦經驗有關。其可以被視為一種1960年以來新社會秩序的徵兆：個體在越來越小的社會支持，以及越來越多的不平等、競爭與不穩定之下，被要求擁有更強的自我責任與自我實現。在後福特主義的積累制度以及個人真實的浪漫理想之間，「選擇性親和力」(elective affinity)促使一種新的主體成為人們主要的關注——新自由主義的「自我企業家」預設人們應透過回應「做自己」的期許來取得市場上的成功，或是像某本暢銷自助書籍說的那樣：「最好的你：做自己，只會更好」。這樣的企業化主體要求的並非紀律的服從，而是維持一種不尋常的生活——

>>

既追求在嘗試中創造、發現自我，也追求情感交流，並能富有彈性地適應於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

憂鬱個體的存在，即呈現出這種成為自我企業家的要求，對主體來說是充滿問題的：實現真實自我的要求造成空虛感與耗竭、追求進行自我決定的自主性則帶來了異化的感受。憂鬱不只是臨床診斷的問題，也成為了各種主體性失敗的關鍵字，且與二十世紀以來的規範性期待有密切的連結。

> 耗竭的危機與政治

即便這樣的社會格局——我們將其喻為「憂鬱的社會」——充斥著逐漸提升的張力，過去十年間，人們卻有辦法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其穩定。在二十一世紀之交，這樣的制度安排似乎藉由明確的政治主張以及組織化的社會抗爭，阻止了憂鬱症狀被表達出來。如今，這樣的秩序承受的壓力更加強大，以至於其存續受到嚴重的損害：憂鬱的耗竭本身正面臨耗竭。在此背景下，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對於「後憂鬱集合」(post-depressive constellation)展開討論。在個情境中，憂鬱症秩序的社會—心理張力已經來到巔峰，導致了各種反應和抗爭，卻仍未建立一個新的共識和穩定的制度框架。

我將論證，上述說法的基礎，在於過去幾年內更常見的政治抗爭形式，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對兩種既有主要張力的應對：新自由主義，以及企業化憂鬱的個體性。

關於「自主性」的問題，這種對主體性的承諾，是一個人能夠透過作為企業家的主動性達成自我決定：藉由在當今社會生活所組成的各種市場中，提供一種創新的產品，個體將能在這些市場上留下個人印記，並以自己的形象和方式進行改造。然而，在履行這樣的承諾上反復失敗，反而導致了一種強烈感受，即人們受制於一套預先確定的規則，而這些規則往往是難以理解和修改：是「沒有別條路可以走」的。因此，很自然地，這個時代的一些社會運動，表現出對統治精英的明顯不滿，並要求給予人民更多的參與權：我們可以將其理解成一種，對於社會監管這種普遍形式下宿命論的反應。

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性的另一個張力，則是關於真實性的問題：在與社會承諾的人和人的情感共融，以及將社會生活作為原子化個人的市場競爭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正如柴契爾夫人所說：「並沒有『社會』這種東西」）。每個人都應該是一個自給自足個體的這種要求，促使人們的孤立感和社會斷裂感更加擴大。因此，許多這個時代裡的政治運動，自然也表現出一種對於情感共融經驗的渴望；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對社會「崩解」(disintegration)此種普遍形式的反應。

然而，要描述後憂鬱的情境，並不能止於單一的政治行動或組織的凝聚方式。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新的秩序，而是一個新的集合，一組不同的反應和政治視野。在下文中，我將討論過去幾年中變得突出的兩種政治立場，但他們不應被視為當前危機中的唯一立場。我們的現狀是以一個尚未得到單一、普遍解答的核心問題為框架——在憂鬱之後的是什麼？

> 後憂鬱的歡騰

從阿拉伯之春到占領華爾街、從2013年6月的巴西到法國的「青年黨」——許多2010年代興起的政治運動，皆在其決定性的時刻中，以一種結構模糊的集體情感沈浸經驗為特徵，並且缺乏明確的目標。對於理解它們為何可以被看成是後憂鬱情境的表達來說，這兩個特點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社會運動在規範和情感上的模糊性經常遭受批評，卻也是其吸引力的基礎：其允許一種基於參與共同氛圍的團結感、一種認為社會和政治差異不再是不可調和的，而是可以由多樣性中建立起的情感統一。這對理解這些運動的主旨非常重要。與自我企業家的自給自足，還有憂鬱症患者的孤立無援相比，許多人認為和眾人在街頭的共同經歷，是一種情感上的解放或宣泄。

不言自明的是，這種（相當不明確的）情感團結，是立基於眾人對抗著一個共同的（且同樣不明確的）目標：即政治制度、普遍的機構、「在那裡的一切」(all that is there)。集體的歡騰(effervescence)體驗，由於對既定規範的激進挑戰（即使是瞬間的）被集合在再一起，而得到了增強。與警察對峙，封鎖街道、占領公共機構：突

然間，生活似乎不再受到一套不可改變的、致命的規則約束。相較於自我企業家是應於一套預設的規範，以及憂鬱症患者的無力感，挑戰既存秩序的經驗，能讓人感覺自己重新獲得了有效的集體自決能力。

然而我們也知道，這樣的時刻內部常常是不穩定的。人們很快地認識到，這種團結感是由難以調和的異質元素所組成；參與者也漸漸發現，他們的規範性立場可能會導致與現況極度不同的政治安排。正是因為這些運動的規範性模糊，以及情感的不確定性，一系列新的張力誕生了。在這些關於此種矛盾集體經驗的政治意義與制度節點的抗爭中，新的張力成為了抗爭的特徵——在這樣的抗爭中，除了其他政治立場外，還出現了新一輪的極右運動。

> 後憂鬱威權主義

社會分裂的日益增長，也許可以解釋新右派的崛起原因，以及其為何以對情感共融的強烈期望為特徵。這與2010年代的社會運動中發生的情況類似。沉浸於異質群眾裡的經驗，作為一種不明確的「共同點」，使得更加強調調統一和排斥的國家共融概念有了空間——例如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或是 Bolsonaro 說的「巴西至上，上帝至上」。

這種政治型態是面對社會崩解而產生的，是一種侵略性的、反動的回應：其認為只有將無關的、腐敗的事物排除甚至消滅，情感的團結才可能實現。不管對象是連結著左派的「共產主義者」、連結著種族化貧窮的「罪犯」，還是連結著女性主義與LGBTQI+運動的「家庭的敵人」，皆是如此。

然而，新的極右派不僅透過推進不同形式的道德討伐來應對情感分裂，其更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回應規範性去合法化的概念。此概念是在2008年的危機和2010年代的政治抗爭後，逐漸受到矚目。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認為社會機構有問題，並不是因為其體現了如憂鬱症秩序這類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而是因其反映了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自然」規範失去效力的世界中。威權主義的主體對於宿命論狀態的反應，與其說是面對一種可感知的無政府狀態，不如說是因應著

不再成立的規範形式——其不再能為社會關係提供秩序和穩定。

這就解釋了為何這樣的政治觀點不像過去的集體歡騰經歷那樣，以停止現有的規範為導向，反而是傾向建立一套壓迫的秩序。為了回應解體、不穩定且反常的社會，威權主義者宣稱，政治共同體可以為此情況帶來解方，並且應寄望於可持續的、有效的強制性與暴力性規範。

除了威權主義之外，新極右派也經常揚言要推動新自由主義方案的再激進化，在巴西的案例中這種狀況尤為明顯。這即是後憂鬱威權主義的悖論：在回應新自由主義主體性危機，並從中汲取反對力量時，其也透過各種方式，嘗試繼續甚至激化這種主體性的形式。其主張，要藉由將「憂鬱」的狀態推回正軌以超越憂鬱；而這種矛盾的結構，正是其具有潛在的、巨大破壞力的原因之一。

於此，威權主義和激進新自由主義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或著說，後憂鬱的方式——融為一體。兩者的政治結盟，一方面導致一種概念，即是情感共融的創造，是立基於排除、消滅那些反抗腐敗的企業家自我，以及拒絕做一個「好公民」的個體與群體之上的。另一方面，其塑成了另一個理念，即唯有堅決、甚至暴力地確保「市場法則」的執行，才能創造一套足夠有凝聚力的規範性原則。任何其他的選項，都是不被接受的。

> 憂鬱之後？

如果將這種新威權主義和激進新自由主義的結合，視為當前形勢帶來的唯一或主要視野，那肯定是一種誤導。雖然我無法在此文章中進行，然而我們需要更全面的分析，並關注其他政治方案如何應對企業化憂鬱主體性的危機；此危機的張力，可以說正隨著疫情爆發而更加強大。無論我們在面對這個議題時，採取什麼樣的集體行動，都必考量到這些由上述情境帶來的、正持續開展的張力與抗爭。■

來信寄至：

Arthur Bueno <oliveira@normativeorders.net>

> 隱形勞動的 視覺再現

Jenni Tischer, 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 奧地利

由於 COVID-19 的應對措施，許多人正經歷社交隔離、遠距教學、分離或是在不同的環境中獨處。乍看之下，我們也許會將之視為「我們」共同經歷的、一種集體的經驗，甚至嘗試從全球作為集體的角度來思考。然而，根據我在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擔任講師的經驗，我並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的可能性。如今，個人在公共場域行動的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此一特殊的情況也重新凸顯了政治和社會方案將可能帶來非常廣泛的影響。

學校和大學等學習、體驗用途的集體空間，以及公園和操場等公共空間，目前仍只有部分開放使用，這使得人們將生活重心轉移到私人空間。人們失去工作、沒辦法把小孩送去托兒所，相當於失去了一個有花園的周末住宅，只能被限制在自家的狹小空間裡。統計數據顯示，心理和身體上的家庭虐待現象劇烈增加，性別分工問題重上檯面。COVID-19 從根本上向我們展示，社會的運作有賴於系統相關的勞動，以及與生育有關的勞動類型。我們都依賴著那些有償或無償的照護勞動者。每一具身體和其周遭的環境，都需要培育、梳理、清潔、餵養、愛護、照顧、擁抱、關注、治癒、再生。我也想在這裡指出，「與系統相關」的概念是有爭議的，因為這樣的概念同時也代表某些工作與「系統」不那麼相關。

正如我們所經歷的，由於媒體對那些確保我們能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作，開始有更多的關注、超市員工突然成為了可見的存在，人們也因此出現了像是鼓掌等表達感謝的舉動。我的學生 Nora Licka 的論文，探討公開展現的集體姿態，以及作為政治行動的團結現象，兩者之間具有的差異。她的結論是，公開的集體讚賞行為是一種有力的姿態，可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為其帶來希望和力量，讓他們能繼續前進。然而，這樣的舉動並沒有辦法為超市、醫院、日間護理中心等機構的勞動者提供更好、更安全的工作條件，也

無助於實現長遠的平等，或是更好的薪酬和更短的工時。此外，當我們討論什麼才算是「系統相關」的工作時，我們會發現，有許多工作一直是不被看見且無償的；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勞動在私人、家庭領域，或是在夜間進行。

在此背景下，我要介紹並討論我2020年的兩幅拼貼畫，「夜晚清潔工」(Nightcleaners) 以及「服務」(Service)。在拼貼畫「夜晚清潔工」裡，你可以看到從The Berwick Street Film Collective 的實驗性紀錄片—— Nightcleaners(1972-75) 電影劇照中所截取的剪影和人物；以及兩座躺著的大理石雕塑，由一張紀錄 Hartford Wash: Washing/Tracks/Maintenance: Inside(1973) 這場表演的相片中擷取而來。這場表演由藝術家 Mierle Laderman Ukeles 在哈特福德的沃茲沃思學會博物館進行。The Berwick Street Film Collective 一開始的想法，是要讓一群移民和工人階級婦女與女性主義運動者聯合起來；其中一位藝術家，Mary Kelly 是電影小組的成員，同時也作為女性主義運動者參與了 Nightcleaners 的活動。最早的概念之一，是將實時紀錄片作為一部持續時間約8小時的影片，其中只呈現一位女性清潔廁所的過程。藉由擷取 Nightcleaners 的劇照，拼貼畫透過靜止的畫面，呈現女性清潔工在夜間清理上班族留下的髒亂，所具有的潛在無止盡與重複性。在女人的腳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躺在地上的白色大理石雕塑，作為前述清潔廁所畫面的雙重圖像，以一種放鬆的姿勢呈現在相片中。

在美國藝術家 Mierle Laderman Ukeles 表演紀錄照片的背景中，可以看到這個雕塑。這場表演的內容，是藝術家清理博物館地板。1969年，這位藝術家發表了《維護藝術宣言》，其作品整體上闡述了家庭生活、生育勞動和衛生工作等等，未被認可和受到貶低的勞動領域。透過將家務勞動從私人領域轉移到公共領域，她使得這些

>>



| Jenni Tischer,「夜晚清潔工」,拼貼畫,30 x 40 公分。

勞動能被人們看見。『我進行了大量的清洗，清潔，烹飪，更新，支持，保存等勞動。此外，（目前為止）我「做」藝術（I “do” Art）。我將簡單地進行這些日常維護，並把它們沖進意識，以藝術的形式展示。』藉由宣稱這是一件藝術作品，並將之展示出來，Laderman Ukeles 不僅提出了關於可視性和生育勞動價值的問題，也展示了作為系統基礎的物質支持（即使涉及到藝術），如何不可避免地與價值生產糾纏在一起，尤其是在這個過程看似是非物質的時候。拼貼畫中反轉的表現方式，使人們對古典主義內部創造的白色階級意象提出質疑：古典主義無視雕塑的多色性，建構了一種基於單色和純白色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古代本來就是不存在的。

「服務」是另一幅由報紙上的圖片組成的拼貼畫，描繪了一個女性在另一個戴著耳機的女性前面打掃。正在打掃的女性身著藍色制服，是由背面呈現；另一個圖像中的女性則朝著我們微笑，看來是代表著愉快且友善的服務人員。這幅拼貼畫強調的是，就如雞毛撢子和吸塵機器



| Jenni Tischer,「服務」,拼貼畫,30 x 40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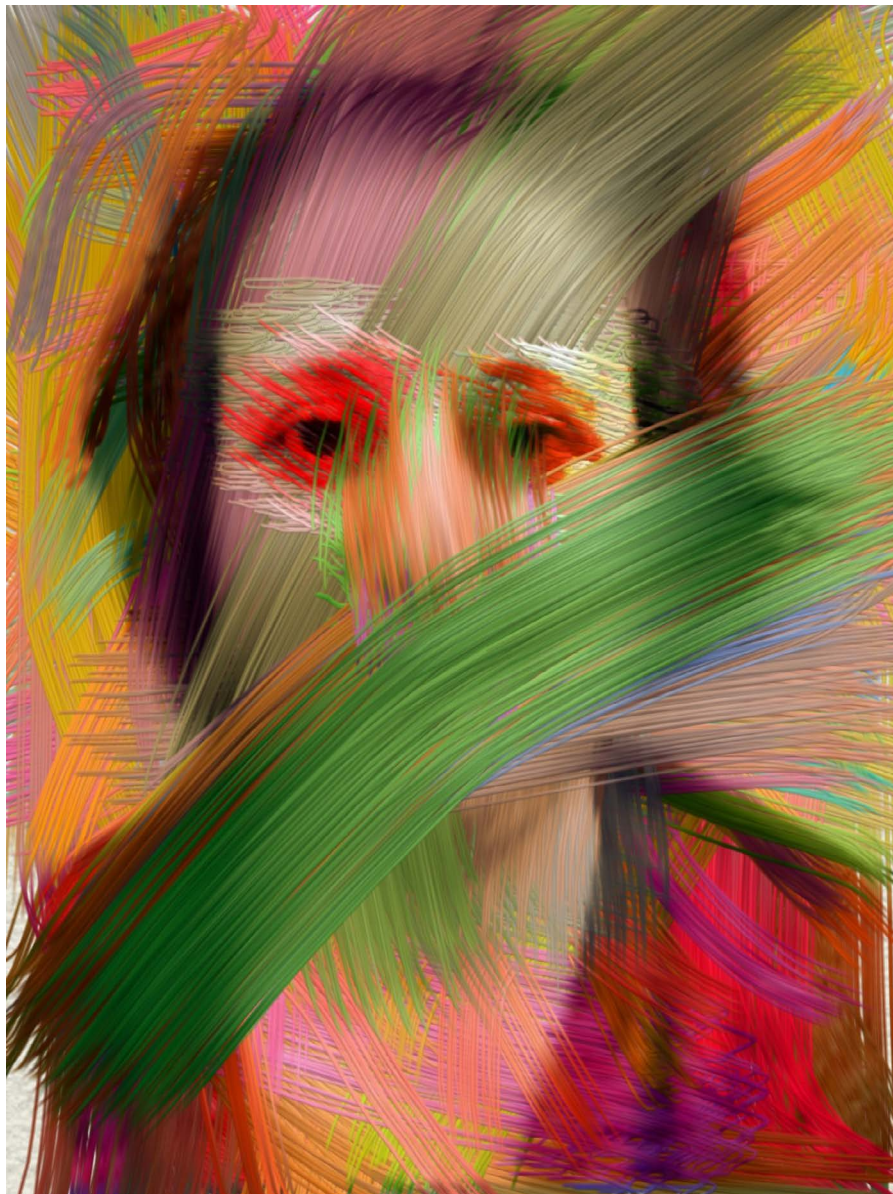
人在拼貼畫上的結合所代表的那樣——即使技術、設備能夠改變，要藉著使用不同的形象或設備，來為服務業勞動的價值化帶來改變也是不可能的。表現、價值化、隱形勞動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仍需被強調並得到解答，人們如何藉由階級、種族與性別去定義何謂「骯髒工作」，其背後的結構才得以被處理。■

來信寄至：

Jenni Tischer <jenni.tischer@uni-ak.ac.at>

> 疫情中的家庭暴力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國, ISA 前主席 (2014-18 年), ISA 種族主義、國族主義、原住民和種族研究委員會 (RC05)、移民社會學 (RC31)、婦女、性別和社會研究委員會成員 (RC32)、人權與全球正義 (TG03) 和暴力與社會 (TG11)



| 來源: [Flickr/Jane Fox](https://www.flickr.com/photos/janefox/).

家暴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行使權力和控制的展現，它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表現：身體、情感、言語、性、心理和經濟上的。然而，雖然家庭暴力發生在所有社群中，但不能一概而論。每個案例和關係都有自己的權力、優勢和控制上的脈絡差異。基於種族、民族、階級、性別、性取向、種姓、文化、年齡、地區、宗教和移民身份的交織，也存在複雜經驗的差異。研究顯示，家暴在微觀到宏觀層面對弱勢族群產生了更嚴重的影響。COVID-19 疫情已經證明這是正確的，因為弱勢群體在失業、經濟困難和感染方面承擔了更多（例如，那些第一線接觸病毒的高風險工作，但／或同時缺少醫療健保資源）。

> 疫情狀況

自 2020 年 3 月以來，來自多個國家的報告顯示，實施的封城和各種限制措施加劇了性別暴力，尤其是針對婦女和兒童的暴力行為。那些遭受虐待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難以逃離，這樣導致他們與朋友、家人、工作場所和其他支持網絡的疏離。這樣的情況使施虐者能對受害者持續地監視和控制，並通過限制食物、衣服、醫療保健和衛生產品的獲取來監視和約束他們。疫情還無意中阻礙了急需社區和心理健康資源的人

>>

在 危機和不確定時期，家暴增加這一事實已得到充分證明。當前的 COVID-19 全球疫情也不例外。自 2020 年 3 月以來，新冠病毒已導致全球的封城、居家防疫、就地防疫等命令，政府強制要求限制人們的行動。雖然這已被證明是減緩病毒傳播的必要步驟，但它卻

導致了家暴問題像疫情一樣蔓延。諷刺的是，對公共健康和安安全至關重要的隔離政策對於處於家庭功能喪失和暴力對待的人來說，這並不意味著安全。同樣由疫情引起的經濟和精神壓力導致了一些以前不存在的家暴事件。對那些受虐的人來說，疫情的封鎖加劇了暴力，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導致死亡。

或取幫助的機會。恐懼和缺乏可行的替代選擇也迫使受虐者與施虐者待在一起。

疫情減少了我們很多制度性的和社會的支持。雖然權力和控制仍然是家庭暴力的核心，但疫情帶來的壓力和困難，包括糧食不安全、失業、恐懼和焦慮、沮喪、抑鬱、疏遠和悲傷更加劇了這樣的情況。學校和托兒機構的關閉在各個層面加劇了這種壓力，加重家庭負擔；也增加了受虐兒的風險。疫情中家暴受害者在家庭溝通和尋求幫助有了更大的挑戰，尤其是實體辦公室因疫情關閉而只能上網求助的情況下。然而，疫情也促使一些組織開始創造性地思考新的方式來接觸和提供急需的服務。

疫情爆發初期，這個問題受到了重視。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呼籲各國政府採取措施應對家暴激增的問題，並解決婦女的安全問題。許多團體和社區組織以及反暴力組織一直以多種方式回應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美國，全國家庭暴力熱線報告指出，與 2019 年同期相比，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16 間來電總數增加了 9.5%。它還記錄了施暴者如何利用 COVID-19 進一步控制和虐待受害者。現在那些施暴者虐待和控制行為的方法還有拒絕提供食物以及扣留基本的健康照護物品，例如肥皂、消毒劑和口罩。在一些國家，由於獲得法律系統和其他支持系統如警察、收容所和法院的機會有限，而且收件被疫情延誤，因此施虐者對受虐者的管轄權不減反增。對於移民來說，擔心被驅逐出境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況。在疫情期間，國家著重於內部和外部移民問題的政策和做

法忽視了遭受家庭、以及基於性別的暴力的人。

由於處理家暴組織在疫情期間還是要遵守政府防疫規定，因此他們不得不改變工作方式來支持受暴倖存者。在紐約的南亞婦女之友(Sakhi for South Asian Women)執行董事 Kavita Mehra 解釋說：

「在 3 月和 4 月期間，雖然紐約市實施了就地保護令，但南亞婦女之友服務的社群是那些受害最為嚴重的。從我們的團隊與那些，特別是住在布魯克林、皇后區和布朗克斯的受暴倖存者對話中，他們看到暴力形式不斷升級並變得更加極端。與此同時，他們正在應對疫情帶來的意外經濟影響，以及導致前所未有的住房、食品和公共設備的不安全比率前所未有。聯邦政府預算的有限支持讓一些倖存者鬆了一口氣，無列冊登記的受暴者/或仍與施虐者共用銀行賬戶的受暴者得不到保護。為了支持我們的社區，Sakhi 在 2020 年 3 月至 10 月期間分發了超過 130,000 美元的緊急援助和近 16,000 磅的食物。」

一些防止家暴組織發現，由於人們在家庭的限制面臨恐懼和缺乏隱私的困難，因此他們沒有接到那麼多求助電話。

> 社會學者能做甚麼？

解決家庭暴力問題不能等待疫情過去。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必須在全球社會學的脈絡下，與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政策制定者、運動者和其他厲害關係人一起制定方案，以結束與性別相關的暴力，並帶來結構性改革。我們需要更好的方

法來收集和報告數據。我們需要了解在 COVID-19 期間影響家庭暴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動態，我們必須用這樣的認知來採取行動。是什麼阻礙或協助婦女和兒童在災難期間遠離暴力？我們看到了哪些挑戰和成功？利用交叉方法，我們必須使用我們的知識、理論和分析來突顯、行動和介入這些議題。我們需要支持那些正在尋找創造性方法來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的組織和倡議者。在人類歷史的這一時期，我們自己必須重新構想如何應對家庭暴力和所有性別暴力。受暴的婦女和兒童在封城期間受困家中，而情況迫在眉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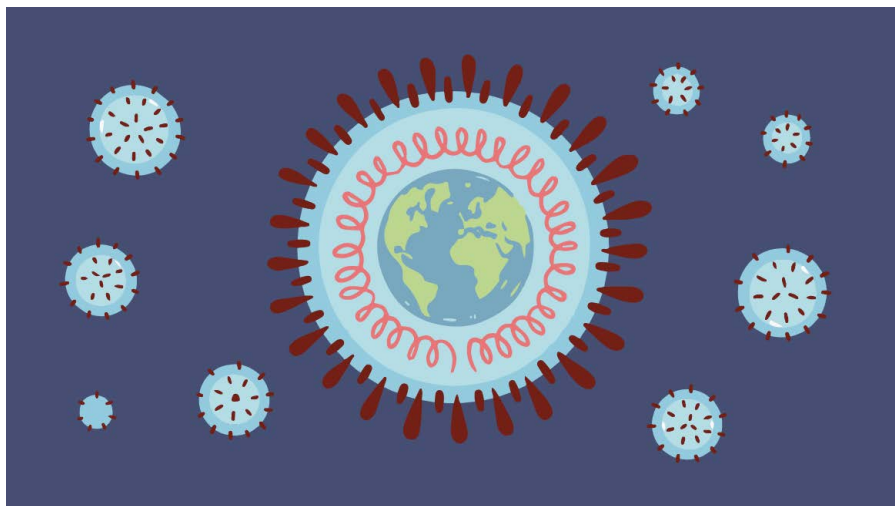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COVID-19 危機下的 新社會學與女性主義

Karina Batthyány, CLACSO 執行秘書, 烏拉圭, 以及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來源: 創用CC。

也就是南美軍事獨裁政權下興起的滅絕系統，瓦解了社會學的自我生產條件，中斷其自1960年代以來急速開展的全球化衝擊。

其次，常識是先於科學，後來才被科學吞噬的。這種新的全球歸屬感仍處於萌芽狀態，還沒有辦法以新的理論和分析工具以及實際行動來重新為自己編碼。如果我們決定認真面對COVID-19的現象、全神貫注地沉浸其中，我們就應該要完全地讓它席捲而來。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通常願意以某種平靜的心態，去承擔「真理只是暫時的」這樣的前提，卻不願承擔這種肯定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每一個被創造的觀點和思想，都需要被完全摧毀或自我毀滅，並得以再次被創造。這是避免舒適地生活在已知假象中的唯一方法。

> 世界社會的新理論

正如世界社會不是單一位置的產物，世界社會的理論也不能是如此。一個世界社會可能類似於一個高階網絡，其能夠區分、整合和連結整個國家、地區和全球的社會場域。我們

對社會科學而言，COVID-19 疫情蔓延的巨大危機帶來了新的觀點，即認知到我們很難去否認自己雖然生活在一個地域性社會，卻越發與全球相互依存。2020年之前，社會研究還能為自己避免全球觀察框架給出可被接受的理由，但是情況已不同以往。這場疫情開啟了一種不可逆的、沒有回頭路的關注過程，其最終將對所有的研究主題帶來影響。

如果我們繼續無視全球社會的存在，將會陷入嚴重的不合時宜。如果說航海時代征服美洲開啟了物質的全球化，那麼 COVID-19 呈現於數位螢幕上帶來的打擊，很可能會將全球化永遠地轉變為日常。因此，與其說COVID-19的化身擴大了物質全球化的進程，

不如說COVID-19化身的集體進程，正為精神全球化的進程帶來擴展。我們並非在見證微觀社會中正衰落的感覺和主觀奇異化，而是在一種垂直、陡然、難以想象的狀態中，結束了對於作為社會核心的世界動態，長久以來的無知和歷史性否定。

> 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機制

知識生產議程的機制如何轉變，並不是未知的。社會變遷通常是依循著兩種原則。首先，是歷史事件和過程，決定了社會科學中知識生產的準則，而不是反過來運作的。COVID-19的傳播作為一個「外部」和客觀的事件出現，大大地影響了社會科學領域。四十年前，另一個「外部」地域性事件的發生——

「COVID-19的世界危機使我們有機會在創建世界社會的新理論方面取得進展，以便所有社會學從每個歷史地點更好地面對社會、性別和經濟不平等的日益全球化。」

可以假設，世界上的每一個社會節點，都是這三個相互作用的領域直接／間接的獨特凝結。德國的全球社會與阿根廷、烏拉圭、墨西哥、智利或中國的社會肯定有所差異；但所有的國家，都在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構成了世界社會。單一的父權制或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是不存在的：實際上存在的是具體的父權制模式，以及世界社會中，中心資本主義和邊緣資本主義之間不同的主體動力。

肯認這套至關重要的差異性原則，並不會使發現普遍規律性的可能消失，卻能夠確實將結構性的關係與過程，以及把不同地點視為具有相同模式的可能降至最低。認識到社會的主要構成是世俗的，即意味著：社會科學和社會學的物質性也是世俗的。1960年代以來，拉美社會學不再是社會學的「他者」，也不再是其簡單的異化再現；而是世界社會學的一股活躍潮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真正需要構建的世界社會理論，應該關注的是如何介入地區的新興知識群體，在自身看待差異化總體的觀點，以及來自其他位置的觀點之間取得平衡。並且，從這樣的實踐中，使必要的人類學行動得以可能，嘗試真的「將自己置於他者的位置」。從這樣的觀點出

發，世界將不是關於「收集所有現有知識」的征服，而是藉由創造一種新的全球對話，我們得以考量到由每個歷史位置的節點而產生並投射的世界觀中，形塑新的結合。

COVID-19的世界危機，使我們有更多機會，為社會學創造新的世界社會理論。新的全球視野將使我們能夠從每個具有歷史性的位置出發，更好地面對社會、性別和經濟不平等的日益全球化。對批判女性主義觀點來說，更全面的全球化視野，無疑將為其結構性社會轉型計劃帶來助益。這將會是一個，對政治運動的物質部署進行知識調整的過程，而政治運動本質上即是全球性的。

對於現代批判社會學來說，這個問題更為複雜。其觀點的進一步全球化，並不一定會導致社會參與科學，更不會導致潛在的改革性社會學。為了理解為何數十年來，這樣的改革性觀點，並沒有產生學術以外的政治效果，我們必須進一步對現代批判社會學中的政治承諾概念提出質疑。我們認為，將這種實踐置於社會改革的總體政策之下是有必要的。現代批判社會學的發展與政治密不可分，並試圖尋求與運動和國家政黨政治的新連結。這和離

開學術舒適圈的議題有關，就如同1970年代之前的社會學潮流——至少在拉丁美洲是如此——以及現在的女性主義批判思想。為了面對並處理國家政治，我們需要的是一套整合現實的原則；對於以批判為目的的原激進主義，以及極端烏托邦主義時常面臨的質疑：我們應該如何「為了所有人」走向一個更好的社會，這將是最好的解方。反過來說，現代批判社會學的這種政治轉型，也是與女性主義進行有力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條件。

這些目標如何達成，將取決於我們建立一種知識、科學和政治社區的能力，在這樣的實踐中，我們能夠藉此構成具有足夠力量的集體倡議，以促成結構性的改變，進而改變社會在這個動盪時期的進程。■

來信寄至：

Karina Batthyány

<kbattyany@clacso.edu.ar>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

> COVID-19 駭人的 全球影響

Mahmoud Dhaouadi, University of Tunis, 突尼西亞・ISA歷史社會學 (RC08)、宗教社會學 (RC22)、言語與社會 (RC25) 研究委員會成員



COVID-19大流行病襲擊了人類集體存在最基本的社會要素：社會互動。社會隔離將如何影響我們未來的日常生活？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就各層面來說，新冠病毒疫情是非常不尋常的全球災難事件。特別是在先進社會中，疫情也引來了醫療專家趕至前線，幫助減少死亡人數和感染率。其中一些地區和其他地方已不止一次被迫大規模封城數週，

美國和英國是最先開始的例子。因此，這股危機應當成為社會科學家的首要關注點，不僅是從量化，還必須從質性角度進行分析。這類分析對於改善地球當前和未來的狀況而言，可能非常地重要。

> 社會科學必須關注自身

COVID-19的疫情衝擊了人類集體生存最基本的社會範疇：社會互動。「待在家裡」的口號已成為了大多數國家會使用到的關鍵詞，而正常的社交互動已在全球各地停擺。在社會內部、社會之間的正常社會互動已經與以往不同，也幾乎不可能排除新型冠狀病毒在未來所帶來的影響。病毒在目前全球各地的出現以及它未來幾年的潛在持續性，可能會成為主流人們與社會生活形式裡的一部分。

COVID-19的疫情導致了一些特定的問題。在社會學下，駭人的疫情產生了一個新的全球社會問題，社會科學必須為此找出新的概念並構想新的工具，像是一些與已故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1922-82)不同的思考方法。高夫曼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像是給了我們一本全新的社會學概念詞典，其有助於理解面對面互動的微小細節。然而，在持續的全球疫情之中，需要發明潛在的新社會學概念來分析這波疫情對人類的數種後果：生活的不確定性、失去對事件的控制、只關心眼前的現在。質性社會學可能更適合處理這些新特徵。然而，社會科學背負的卻是雙重的任務：

首先，我們需要研究目前COVID-19 疫情對人們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和心理影響；以及自2019年12月以來那持續經歷危機的社會，其中的不同動態。《科學人》雜誌在其2020年6月和7月的期刊中將焦點關注於，新冠疫情對人們的社會

和心理影響：「人類如何面對逆境：我們從疫情中學到什麼？」六月號強調了公私立醫院和診所的醫生、護士們所面臨的壓力。然而，在2020年8月的一期中，該雜誌反而對冠狀病毒採取了相當平靜的敘述語氣，其中提及社交距離是在動物之間的一種自然現象，動物以此避免被其他生病的動物感染。雖然這可能是真的，但從長遠來看，對於正常的「人類」社交互動來說，社交距離顯然仍存在著問題。

其次，如果在未來幾個月或幾年內找不到根本性的解決方法，現今的社會就必須要去設想，在疫情持續下世界中的社會生活樣貌。為了應對疫情的後果，這兩種類型的研究結果都會部分地開創與當前主流社會科學不同的新社會科學。而新冠疫情的其他主要特性，正在對社會中的社會團結產生影響。西方先進社會被描述為個人主義的，據說社交媒體網絡更強化了這種個人主義。而社交距離以及其他偏向社會隔離的抗新冠病毒措施的倫理與實踐，必將在這些社會還有非西方社會中加強個人主義和孤獨感。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對個人、團體、集體和社會之間的正常社會互動所產生的全球性破壞。

> 氣候變遷和仇恨言論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與COVID-19疫情相關的大問題：氣候變遷和仇恨言論。一些分析人士將新型冠狀病毒所帶來的疫情解釋為：人類在地球上的所作所為所導致的全球性污染。而這些污染對於氣候變遷會產生負面影響，或是像一些

當前的理論所指出的那樣，很可能會產生新型的危險病毒，以上正是以最初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的中國城市，武漢為例。無論新型冠狀病毒出現的原因是什麼，全球性的病毒感染正是一個令人費解和眼花繚亂的挑戰，它促使了現代科學家必須在他們的學科實踐中更加謙遜和謙卑。在他們的科學倫理之下首先必須做到的，就是最小化他們科學工作可能會導致的潛在問題。

至於世界各地的仇恨言論現象，在COVID-19的疫情期間和疫情結束之後都很可能會呈現增加的趨勢。仇恨言論是一種基於他人的宗教、膚色、性別和種族去貶低、虐待或是排擠、歧視他人的行為。仇恨言論的出發點通常是抱持著一種對個人、群體或整個社會或文明感到不悅或敵對的態度，而預計「新型冠狀病毒」將會被添加至會引起仇恨言論的清單之中。受新型冠狀病毒嚴重影響的國家的公民們，他們在出國旅行之時將會遭遇越來越多的歧視和仇恨言論。因此，正如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8月所預測的那樣，全世界的旅遊業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而且在未來幾個月或幾年，這份衝擊還會持續下去。有一個悖論是，現今全球性的COVID-19 疫情本應使我們的社會團結起來，但它對歧視和仇恨言論幾乎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因此，全球旅遊業在現今會受到影響的原因，很可能不只是受到流動性的限制，還可能是因為仇恨言論和歧視在全球潛在地增加的緣故。■

來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 後疫情時代的假想情境： 從調適到集體學習

Alejandro Pelfini, Universidad del Salvador, 布宜諾斯艾利斯, 和 FLACSO Argentina, 阿根廷



| 來源：創用CC。

雖然我們還處在 COVID-19 疫情當中，它的影響和損害依然難以計算，且對它完全進入掌握之中的預估日期也猶未可知，但社會科學並沒有停止思考後疫情世界可能出現的情況。全球危機的影響之深，以及疫情對日常生活和資本主義運作上前所未見的影響，是如此劇烈，以至於本文的反思超越了對疫苗可用性的猜測、公共衛生系統的重組和世界衛生組織內部的國際合作。相反地，考慮到疫情是一項重大的文明挑戰，本文將著重於在極端情況下進行真正學習的能耐，以及整個社會面對創傷的情境、社會和人們共享前所未有的結構脆弱性時，所需要的復原能力。

> 後疫情時代的可能反應

正如經濟學家 Branco Milanović 所展示的，在其他超出經濟範疇、且對公共衛生造成挑戰的全球危機之後（或是大戰之後，例如 1873 年或 1919 年），國際體系和某些社會在其發展模式和政治組織方面發生了重要變化。因此，認為這次疫情也將導致生產、消費和生活模式發生重要變化，並不是烏托邦似的空想，將會再次展現資本主義和現代性適應新挑戰和重新省思自身的能力。當然，事情發展也並非保證如此，而是取決於行動的發起，首先進行反思，再來便是促成這些轉變的政治行動。

目前看來，疫情以後的第一個反應，以及隨之可能出現的情境之一，是特殊主義的隱退。由

於某些國家（Trump 領導的美國或 Bolsonaro 領導的巴西）已經經歷過這種情況，因此不值得在這點上多做停頓。這種反應是繼續使一切照常進行，並躲在民族國家的假象背後來推廣世間萬物恢復常態，同時無視疫情所造成的全球影響，以及現狀下和激進相互依存的關係。相反地，探討兩種可能的轉型情境會更加有趣，這兩種可能情境將會取決於人類的能動性和社會的反身性。我們可以從這些能力中區分出兩種等級或程度上的轉變：第一步將和調適有關（可理解為依據環境的新複雜性，調整自己的偏好和興趣），以及第二個，即門檻更高的集體學習過程（代表以降低所造成傷害的道德義務為原則，回頭檢視前述這些偏好和興趣的效度）。

>>

> 調適

那麼，如何構想一個主要的調適情境，其中三個基本社會領域（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針對一個更複雜且更具挑戰性的環境，發展出一套溝通上的調整，同時無需重新思考或完全放棄已經建立、卻確定有害的固有作法？在國際層面，這將會是強化多邊主義。在國家層面，國家的角色會更顯突出，雖然在致力於公共衛生的同時，國家會更加關注證券化和對隱私的監控。從市場上，我們可以預期到更多的商業貿易保護主義和公共投資；數位化的加深；促進科學合作，但不改變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比起純粹金融化，生產經濟（productive economy）和所謂必需商品和服務將會復甦。透過聚焦在公民社會，將會促進負責任的消費、輔助性原則（subsidiarity）和自我照顧（self-care），並更加關注永續發展，儘管是在低強度的民主框架之內。

> 集體學習

另一種具有更大改革潛力，但要求也更苛刻的反應，是更深入的集體學習過程，這需要超越談判和國際合作的現有秩序，進入全球治理的新領域，專注於提供並保護公共產

品、降低風險和預防災難。這會反映在全國層級的公共政策上，政策概念將圍繞在照護和降低使用公共財時的不平等。在生產和消費領域，將推動短途物流和在地貿易、生產，同時強化小城市，並以「必需」活動為基礎進行重估的經濟；最後，同樣很重要的一點是，現今北方和南方在智慧財產權和專利方面的糾紛，將為更平等且包容的制度鋪路。公民社會將漸漸構成一個「產消合一者（prosumers）」網絡（J. Rifkin），全球在地化的水準將會浮現，對性別差異敏感的照護網絡將會擴大；受到替代理論，如後發展理論（post-development）和去增長理論（degrowth）的啟發，將開啟轉型的空間，使一個在平等使用資源方面實現基本民主化的政治化過程成為可能。

這些替代方案中，哪一個更有潛力？哪些因素才能使它盛行？我們已經意識到第一種非轉型反應的侷限了，幾乎不可能指望它。然而，它終究是一種可以考慮的選項，且依然有它的擁護者。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已經展現了它們調適和改革的能力，甚至還包含針對它們最激進的批評（正如 Boltanski 和 Chiapello 在《資本主義的全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所展示的）。

因此，「適應」是最有可能出現的反應，且它將會幾乎機械式地發生在專業體系、大公司（尤其是與數位化有關的公司）和眼光狹隘的政治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中。在此同時，門檻最高的集體學習將依賴社會運動和大眾組織的激進化和活化，這些運動和組織需要不只做到一個偉大的援助和預防健康風險計劃，還要放眼全球綠色新政的實現，或是更好的，南方社會生態公約（the Ecosocial Pact of the South）——在南北對話中，環境正義將總是被視為社會正義的一環，並放在一起考慮，且生產性工作的中心地位將會首次被生命優先所取代。毫無疑問地，這個選項是最不可能的發生的。但權衡利害之後，這也是最急迫和必要的。■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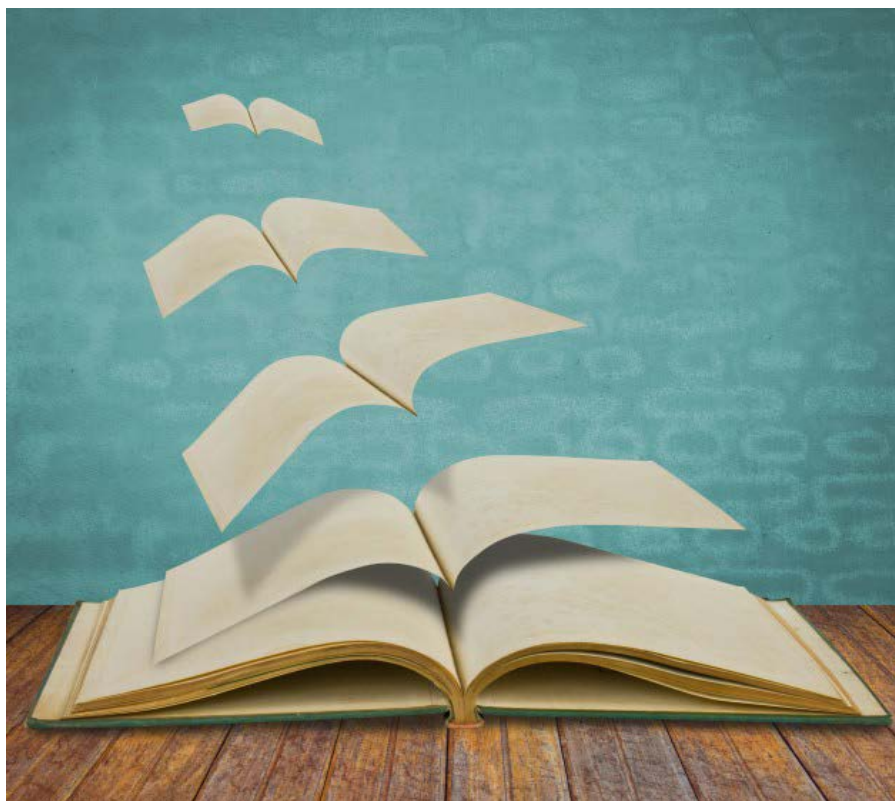
Alejandro Pelfini

<pelfini.alejandro@usal.edu.ar>

> 公民政治學領域的社會學家

Fredy Aldo Macedo Huamán,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IBERO)墨西哥城, 墨西哥

| 來源: 創用CC。



從一開始，社會學家就參與了社會的公共事務（例如 Émile Durkheim、Max Weber、Marianne Schnitger 和 Jane Addams），無論是警示廣大群眾不平等、歧視和苦難等情形，以及社會上許多人遭受的不公正、權力濫用、權利踐踏和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忽視，或是激起學識的、有根據的公開辯論。社會學家藉由運用通俗和刺激性的語言，來參與相關的社會問題，同時不放棄批判性精神和探索性的天職，尋求動搖良知和質疑權力。最近，一位社會學家 Helen Jefferson Lenskyj 和前述的反思非常吻合。Helen 將學者的角色視為公共知識分子，並延伸至她所做的研究，她說：學者「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奧林匹克運動會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並尋求揭開社會問題根源和支持它的壓迫性體制。我們為社會改革提出建議，並與社區攜手合作、挑戰當權者，有時我們會成功，有時不會。我們挑戰的對象通常都是「神牛(sacred cows)」

」—例如奧運會或制度性宗教（並且存在著重疊）—我們的研究發現通常都會顯示『國王沒有穿新衣(the emperor has no clothes)』。」

今天，有一代充滿迷惘但創造力無窮的社會科學家，面對這個動盪和不確定的時代，顯得十分不安。他們對周遭公民和社群的日常生活十分敏感，力求使學術遺產能與實際情況一致，以創造一個創新和反身性的框架，協助我們面對當下的局勢。我認為，正是這點促使 David M. Farrell 和 Jane Suiter 投入愛爾蘭社會，積極參與公民審議式民主的構成，並寫成《重新構思民主》(2019) 一書。他們的成果引起大家的注意，愛爾蘭公民議會作為公民投票的管道，達成了墮胎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¹。因此，平常出現在學術界的理論得到了社會的回饋，同時還探索了與行動者的連結，除了激發問題和議題之外，還使重新設計公有事業和文化的對話成為可能。

>>

如果在日常生活層面，更多行動者集結起來參與政治社群的重大議題—提倡他們的利益和提出他們的要求，加強他們的學習、合作、組織模式，建立管道和行動計劃，建立**權力的空間**，嘗試包含參與管道和民主創新—他們身邊還會有社會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願意支持和推廣他們。

> 社會學家的新角色

因此，在學術界和公民政治場域之間，企圖促進公民能動性的社會學家可以在當代民主國家的多個行動領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鑑於此，社會學家的訓練和實踐，到底可以做出哪些貢獻、參與和反思呢？

整體而言，傳統的學術/專業區分，已經遠遠不及如今更加複雜、相互滲透且多樣化的領域和行動者體系。使這些特徵浮現的情境，仍然值得權衡利弊。

對社會學家而言，回應這些複雜性時，原則上應使他們的大學或研究中心更加貼近公民和政治行動者，同時考慮到他們的需求、限制、潛力和共同框架。其次，在這些不斷變化的領域中，社會學家自身的經驗，將有助於他們依據過往的情況對現行計劃進行測量和改善，吸取教訓，從而促進適合公民的教育意義創新和專業知識。

在民主政治和公民實踐層面，社會科學值得考慮的一種形象是作為「公民顧問/調解人(citizen consultant-mediator)」的社會學家。

透過參與公民部門，社會學家需要借助自身傑出的分析操作能力來推廣願景和成效，並以創意的、教學的、對話的、命題的和情感的技能，佐以激發自我探索、動員力和復原力的方式，來輔助公民和政治行動者(或與之共事)。同時，社會學家進行參與的指導樞紐，來自對民主生活關鍵價值(正義、自由、多元化、寬容、團結、批判和異議、凝聽和合作)的道德堅持。

更具體來說，這些新社會和政治部門之所以出現的先決條件，暗示它們將會容易吸收：

- 在組織內部(或共享的)進化的過程中，獲得更好的元素、技能和經驗，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以民主的方式精進自己；
- 對於他們的目標和具體化圍繞他們認同的理想

(根據民主價值和人權)，會有專注和持續地有所進展；

- 假想一個「公民遊說(citizen lobbying)」平台，目的是制定一項受社會學家影響、並在他們離開以後，重新配置政策的計畫；還有
- 清楚揭示他們可以達成的貢獻，也就是針對不同領域落實民主實踐(與其他社會行動者和專家合作)，將僵化的體制框架重新導向為將國家和公民聯繫起來的包容性和創新方式。

至於社會學家方面，這種工作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十分顯著；他們將成為：

- 論述、敘事和想像的「解碼者(decoders)」，以便他們能對更重要的通訊、文化和政治項目進行再加工；
- 針對根源於組織內部或外部的衝突和張力，擔任「調解者(mediators)」；
- 在對抗公共和私人權力時，作為政治、民事和公共行動過程的「陪伴者(accompaniers)」和「翻譯者(translators)」；和
- 公民、民主和公共政策方案的「表達者(articulators)」或共同起草者(co-generators)」，這些方案未來也會被與他們合作的公民團體採用。

簡言之，在如今盛行的兩種嚴重威脅—極右翼民粹主義和科技公司的巨大力量(與政府監控系統相關)—之間，公民需要以清晰和積極的態度回應它們，闡明他們的民主聲音和治理能力，這將會強化並變得可以持續。因此，由於迫切需要更新民主方案，公民將尋求重新定位政治學習、知識整合、公民友誼和組織方向。此外，他們還需要和其他行動者建立橋樑，包括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從事者，他們將會樂意地參與其中，結合爭論的、有共感的方法，並帶著充滿活力和自信的衝勁。



來信寄至：

Fredy Aldo Macedo Huamán
<fredy.macedo@gmail.com>

1. 見：<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irish-referendums-deliberative-assemblies/>

> 千里達及托巴哥沈默的 親密伴侶暴力

Amanda Chin Pang,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St. Augustine, 千里達及托巴哥

在千里達及托巴哥，當女性、男性或兒童受到親密伴侶之間的暴力或因幫派相關的戰爭而死亡時，這會馬上引起大眾的關注。然而，受害者和倖存者的哭泣聲卻立刻安靜了起來；施暴者僅僅對他們的暴力行為提出陳腐的託辭，留下迫在眼前、永無止盡的虐待厄運。

在千里達及托巴哥，即使女性、男性和兒童在親密伴侶暴力和性別暴力下被殺害，人們仍始終保持著沉默。一位名為 Andrea Bharatt 的婦女的死去，成為了一種充滿希望的催化劑，釋放了受虐待暴力的受害者和倖存者的哭聲。

> 暴力的文化

自從COVID-19疫情「待在家裡」的呼聲以來，家庭暴力案件就增加了不少——有時「家庭暴力」會被同義地指稱為「親密暴力」——而事實上許多家庭暴力的案件都發生於成年的親密伴侶之間。

受害者的沉默加上他們難以逃避暴力的情況，讓我想到了「一種深植於千里達及托巴哥人的暴力文化」。注意到這些情況的朋友和親戚們都被口套蓋住了嘴，讓我意識到了這些情況。我認為這種面對暴力的沈默深植於殖民主義，且應當被終結。Bergner(1995)的研究：〈那個蒙面女人是誰？或是 Fanon《黑皮膚、白面具》中性別角色的作用〉(Who Is That Masked Woman? Or, the Role of Gender in Fanon's *Black Skin, White Masks*)就強調了這一歷史背景，這不只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還有女性臣服於男性所處的劣勢地位。儘管親密伴侶暴力嚴重地威脅到了伴侶彼此及家裡的其他成員，但在缺少對親密伴侶暴力的直接政策和研究的情況下，讓我開始認為一些加勒

比人已經過於適應這種暴力模式。我將其稱之為「暴力文化」，正如 Brereton (2010) 在〈千里達及托巴哥暴力文化的歷史背景〉(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Culture of Violence in Trinidad and Tobago)中所描述的那樣，因為這種文化已在這個國家裡變正常了。

> 正常化的暴力

我們可以圍繞這個現象思考許多問題。親密伴侶關係中的暴力行為已在加勒比地區的互動中正常化。到底是什麼導致了像千里達及托巴哥這樣的小型雙島共和國內的暴力行為正常化？是因為無法處理伴侶關係上的瓶頸，還是親密伴侶可以接受這種暴力？或是兩者都有？千里達及托巴哥的文化為何似乎助長和縱容了這種暴力，所以才沒有引起公眾抗議？親密伴侶暴力是否被視為私人的感情問題？不管男性或是女性都害怕嗎？

親密伴侶暴力在全球的許多伴侶之間都很普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受暴婦女的統計數據顯示，三分之一的女性可能會在親密關係中遭受親密伴侶的暴力，而全球 38% 的女性謀殺案是由男性親密伴侶所為(世界衛生組織, 2017)。雖然這些統計數據反映了男性對女性親密伴侶的暴力行為，但也存在著女性對男性的親密伴侶暴力行為，以及同性關係中的親密伴侶暴力。美國全國反家庭暴力聯盟(2020)指出，九分之一的男性都曾經歷過某種形式的親密伴侶暴力、性暴力或跟踪。此外，根據這份報告男性的強暴受害者和非合意性暴力的男性受害者，主要都是受到男性施暴。這反映了千里達及托巴哥中類似的情況。Le Franc等人(2008)在「三個加勒比國家的人際暴力：巴貝多、牙買加、千里達及托巴哥」(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three

>>

「在表達自我和關係中，把反對暴力和認為暴力是不可接受的和不正常的作為一種規範，將打破沉默，並最終改變親密伴侶關係，使之更好。」

Caribbean countries: Barbados, Jamaica, and Trinidad and Tobago)中，提出了關於千里達及托巴哥身體和性暴力證據的報告。研究顯示47.7% 的男性在人際關係中曾遭受過肢體暴力，而52.5%男性曾遭受過性威脅。

有趣的是，根據 Wiltshire(2012)在「加勒比地區的青年男子氣概和暴力」(Youth Masculinities and Violence in the Caribbean)中的說法，男子氣概是透過權力來習得，並通過世代、宗教、學校、媒體和朋友等家庭社會化的過程獲得加強。此外，Wiltshire 指出，男子氣概是透過暴力和侵略的行為來表現，也因此一些男性會認為女性有時需要受到男性伴侶的管教。雖然男性和女性都是親密伴侶暴力的施暴者，但千里達及托巴哥的新聞報導總是充斥著女性被她們的親密伴侶殺害的事件。這是因為比起對男性伴侶實施暴力的女性，對女性伴侶實施暴力的男性比例更多。

男性和女性共有的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的觀念，反映了親密關係中無法避免的男性暴力，以及他們對這個問題的默許。此外，當女性不符合加勒比地區對女性的期待時，人們會把她們標記為「不像樣的」，虐待也因此被視為是合法的。然而，透過男性的觀點看待女性如何表達性慾和女性氣質這點，從來就不是可以被濫用的藉口。

> 「沈默」是解決親密伴侶暴力的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許多人正在努力打破這份沉默，讓受害者發聲。千里達及托巴哥工商會的工作場所家庭暴力政策(2018)，以及千里達及托巴哥警察服務的性別暴力部門都是解決親密伴侶暴力問題的政策。聯合國的聚光燈倡議(Spotlight Initiative)將焦點集中在因疫情而增加的家庭暴力事件。儘管採取這些措施，但千里達及托巴哥中的暴力文化以及男性氣質／女性氣質觀念，仍反映該國對暴力文化普遍接受。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安全的支持機制，為伴侶們及施暴者提供治療的選擇，促進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此外也同時呼籲男性們勇於伸出援手。以此來鼓勵那些經歷過親密伴侶暴力的人，幫助他們充權如此一來，就可以使這默許暴力的文化，成為大家能夠勇於說出「不」、能夠公然拒絕暴力的社會。

此外，男性和女性在性的表達方式和性別角色方面，有重新社會化的必要。我認為親密伴侶暴力給受害者甚至是施暴者帶來的恥辱和恐懼，再加上受暴者在受害者心理下的錯誤責任感，導致了這種對暴力的默許。因此，根據Wallace(2019)在「家庭暴力：千里達及托巴哥發生親密伴侶暴力而未向警方報案的情況」(Domestic Violenc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Non-Reporting to the Police in Trinidad and Tobago)一文中，男性和女性的家庭暴力受害者難以向警方報案的主要原因是尷尬、羞恥。然而，儘管有這樣的原因，所得到的總是沉默的回應，而這類事件通常是以謀殺案告終。

若我們能公開反對暴力，並將自我表達和人際關係中的暴力視為一種難以接受的異常行為，在這些事情都常態化後，將能夠打破這些沉默並改善親密伴侶關係。■

來信寄至：

Amanda Chin Pang

<amandalall91@gmail.com>

> 論關照世界的的能力

Francesco Laruffa, University of Geneva, 瑞士

個體應該被視為「媒介」，他們共同決定了社會變遷的走向。
七歲的 Matteo Laruffa 繪。



新冠疫情滋養了關於「後疫情世界」和「我們要的未來」的諸討論。此類討論的核心理念是：疫情不僅是新自由資本主義及其固有的對自然的過度剝削所帶來的悲慘後果，它還同時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社會及其管理方法的機會。儘管如此，對這個想像的未來，至今尚欠共識：有者推動「包容性綠色增長」(inclusive green growth)和促進「綠色工作」(green jobs)的綠色交易(Green Deal)，此推動聚焦於一種能夠在避免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如消費主義)或資本主義結構(如不均稱的僱傭關係)的情況下達到環境永續能力的技術革新；亦有再者渴望更深刻的「社會-生態轉型」，在其中，經濟服從於社會和生態需求的滿足，而非利潤。

據上述，我將對由 Amartya Sen 和 Martha Nussbaum 所發展的能力取向

(capability approach)進行一番激進的詮釋，探索這一理論如何幫助我們去想像一個更具解放性和永續性的未來。顯然，描繪一種有價值的未來並非社會學(或哲學)所獨有的任務：未來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在公民的參與中被共構。我主張：能力取向允許我們對「我們要的未來」採取一種民主式的觀點。

> 關於對能力的激進詮釋

能力取向的主要論點是，公共行動應該將焦點放在促進人的能力，比如使他們過上那透過理性賦予價值的生活的真正自由。在這個觀點下，社會的進步並不同於經濟的增長，而是等同於消除各種通往人類繁榮(譯按：這裡指的是人類的繁榮，而非人類社會的繁榮)之路上的障礙：公共政策應該擴展個人自由以便實現有價值的「存在」(beings)和「作為」(doings)

>>

，如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性化觀念。這一關注迫使我們從最終目的的角度進行反思，並申論什麼是從根底上重要的。除此之外，能力取向還為民主賦予一項關鍵任務：民主參與不僅具有工具性的功能（允許公民發表意見以便促使公共行動能更好地反映他們的利益），而且同時具有建設性的作用，即能夠塑造社會優先事項（societal priorities）以及——有鑑於美好生活的觀念會在審議的過程中改變——甚至是個人的價值。

在此基礎上，我以為，相較於去支配政策圈，能力取向應能以更激進的方式加以框構。的確，能力取向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連結能夠加以更深刻的質疑。能力取向的主要詮釋強調增長自身並非目的，而是實現有價值之目的的手段。然而，有鑑於其對環境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以及對人類福祉的不良影響，經濟增長甚至不是一種合適的手段而應被公共行動完全棄絕。在許多情況下，經濟增長是在人類的苦難及環境的災難中得到實現的：從地震成為建築業經濟增長的引擎到生產造成的污染所導致的各種疾病。即使表面上看（prima facie）屬於積極正面的，實際上卻令人失望。比如，豐裕（opulence）會鼓勵人們採取終將損害人類福祉的，對美好生活的貪婪—物質主義和競爭—個人主義式願景。據此，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僅是無法維持的：從福祉的角度來看，以增長為基礎的「發展」模型的可取性本身就已經足夠可疑。

同樣地，能力取向的核心觀念——即個體應該被當作能動者（agents）來對待——在政策世界中已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人們在此卻是以一種狹隘的能動者涵義被加以構想的，亦即僅僅被當作一種參與到市場中的經濟行動者，而相對地能夠共同決定社會變革方向的民主公民在此卻被邊緣化了。在這種背景下，能力取向被涵括進新自由—個人主義對「培力」（empowerment）的詮釋中，這種詮釋將人的自由降低為參與經濟（特別是勞動市場）與否的自由。能力已然成為人力資本的同義詞：個體成為成功的經濟行動者所需要的一套技能。

透過同時拒絕經濟增長和將人們納入資本主義經濟作為公共行動的理想目標，一個對能力取向更為激進的詮釋將意味著：賦予公民去共同決定社會變革的方向並從最終目的出發去討論

發展、進步以及生命質量的意義的能力。這種理解需要減少市場在塑造集體使命所能造成的影響，以及（部分地）取代它們以參與—審議式民主政治。

> 將公共行動聚焦於「關照世界的能力」

在這一點上，能力取向能夠結合以女性主義理論家所發展的「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正如 Joan Tronto 所建議的，關懷視角突顯了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所關心的：資本主義是一種關心利益的制度，其中對個人的獎勵取決於其對這一利益所帶來的貢獻。然而，我們可以建造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關心他人（包括兒童、老人和病人）、關心環境（以環境保護/維護及環境修復的形式）、關心民主制度並且關心社會自己（運動、藝術、教育等）過於任何的利益。

從這個角度來看，獎勵可以從生產轉移到社會再生產，工作也能夠重新概念化為一種關照世界的活動。後者的涵義應該透過民主審議來界定。進而，民主能夠在確立何謂社會貢獻的問題上（部分地）取代市場。這種建基於社會有用性而非市場價值的對工作的理解，在這疫情時刻隨著對「基本」工人的諸討論而被突顯了。遵循這一框架的議程將能對抗資本主義社會中「垃圾工作」（David Graeber）——綠色或其它——的擴散，並促進個人從事有意義工作的能力。後者涉及一種在勞動市場內或外完成的活動，這種活動能夠為從事該活動的個體提供人類繁榮的機會，並以一种「客觀地」有價值的方式為社會做出貢獻，並且在這點上，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參與到關於「什麼是有價值」的民主式的討論中（Ruth Yeoman）。

總而言之，一旦能力取向對資本主義所採取的批判性願景越發明確，那麼其將能更多地啟發改革論者，並建議將公共行動聚焦於促進「關照世界的能力」而非經濟增長或將人們納入勞動市場，而前者已然包含了參與到關於「什麼是值得關心的」討論中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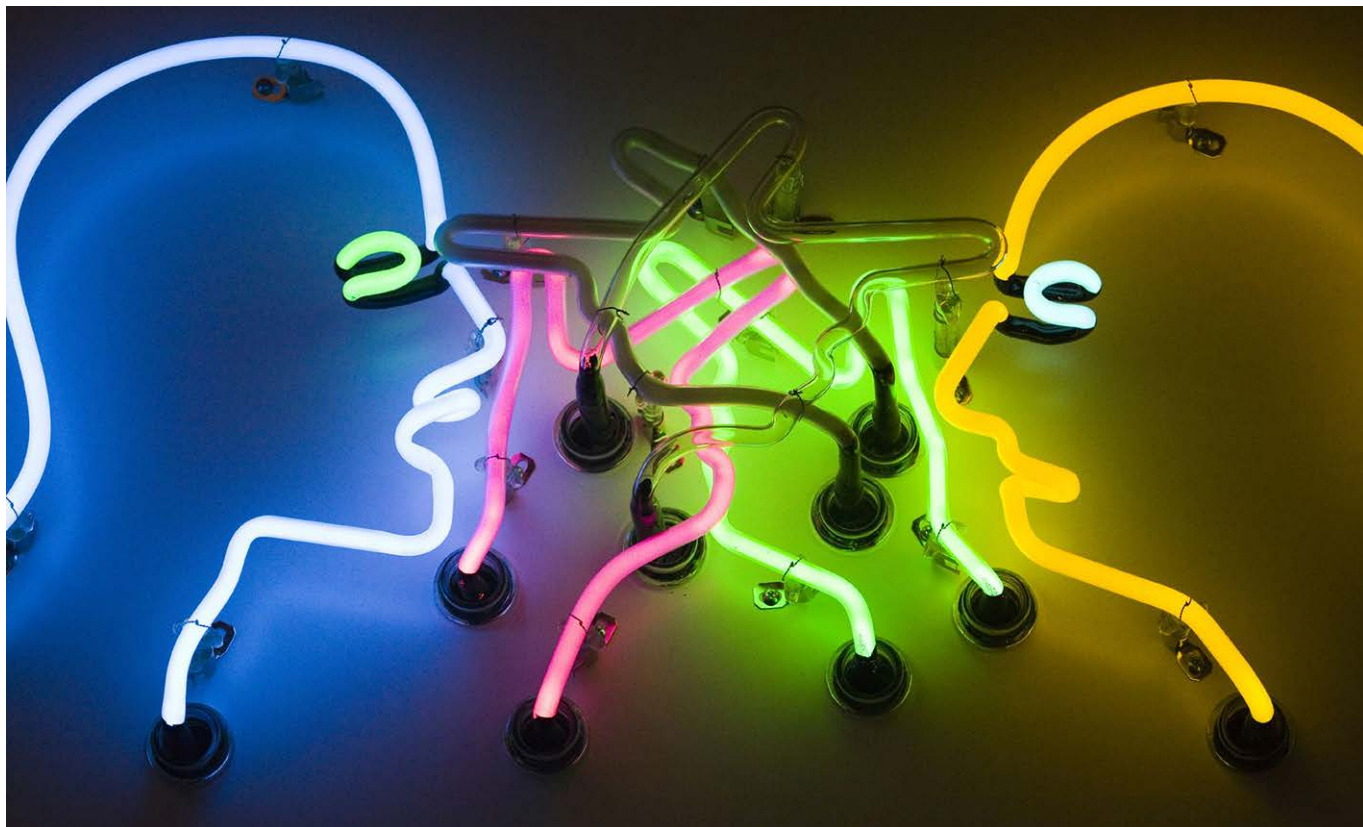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Francesco Laruffa

<Francesco.Laruffa@unige.ch>

> 人類作為文化人

Mahmoud Dhaouadi, University of Tunis, 突尼西亞, ISA 社會學史研究委員會 (RC08)、宗教社會學 (RC22) 和語言與社會 (RC25) 研究委員會成員



人類不僅是說話的動物，而且是不同文化符號的使用者。語言需要被理解為這些文化符號的基礎。

來源：[Flickr/ Thomas Hawk](#)

社會科學中缺少文化人的概念。經濟學家和物質論觀點的學者將人描述為經濟人，政治學家將人稱為政治人，社會學家將人視為社會人。由於現今數字越來越頻繁的被使用，有些人則將人描述為數字人。然而，儘管當代人類學家鑽研在文化研究，但他們並沒有使用與文化相關的術語來描述人類首先是一個文化人。實證主義認識論在社會科學中佔主流地位。它主張感官體驗是知識的基石。許多重要的人類學家都可以見到這種認識論的影響。Leslie White 1973 年出版的《文化概念》中提到 Ralph Linton、Radcliffe-Brown 和其他學者認為，文化是一種抽象的，或者不存在的東西，也沒有指明具體的現實。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幾乎不會對文化這種非感官和模稜兩可的現象表現出興趣。

> 實證主義持續的負面影響

上述那種對文化分析的避免也出現在開創西方社會學的學者中。眾所周知，1960 年前的文化理論家，如韋伯、涂爾幹、馬克思、帕森斯、米爾斯和其他學者出版的作品中對文化抱持弱綱領的分析。也就是說，他們較不重視對文化的分析，文化在他們的分析中比較沒有自主性。此外，伯明翰學派、布迪厄和傅柯也抱持弱綱領的分析觀點。儘管自 1990 年代後期「文化轉向」誕生以來，文化社會學越來越關注文化，也就是所謂的強綱領，但對弱綱領的趨勢仍然主導著今天的文化社會學研究。

> 尋找文化人

我的研究意外地使我對文化研究產生了長期的興趣。我在1990年代的研究興趣激發我去嘗

>>

試發展一個理論框架，來理解、解釋人們的行為以及人類社會的動態。在 Richard Swedberg 2014年出版的《社會理論的藝術》一書中，他認為社會學理論有不足之處。我覺得我應該嘗試探索新的理論觀點，因此我先提出方法論上的問題：探索人類行為和社會動態背後的力量起點應該是什麼？我想應該先從區分人類物種與其他物種的特殊特徵開始。在嘗試區別這些特徵時，我應該從頭開始研究。在追求潛在的獨特人類特徵的過程中，終於發現了我在尋找的東西：文化符號(CS)，即語言、思想、知識、宗教、法律、神話、文化價值觀和規範。因此，對CS的研究似乎是理解和解釋人類行為和社會現象的基礎。我的理論使我將語言視為CS誕生背後的推動力：語言是CS之母。也就是說，人類不僅是古代哲學家與社會思想家所說的會說話的動物，而且她/他還是CS的偉大操作者。因此，我的我思故我在版本是：我使用語言，因此我是人類。

這些理論假設和實地觀察有力地加強了文化人的概念。我發現了四種不同的人類特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人類是文化人。

> 對人類差異的基本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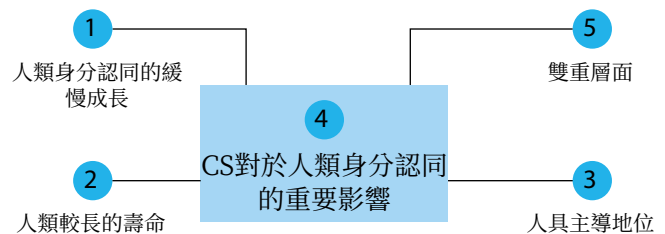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CS作為人身分的核心在當代社會科學可能是新的概念。我對以人類身份(Homo Culturus)為核心的CS以以下概念陳述：

- 1) 與大多數其他生物相比，人體的生長和成熟過程是緩慢的。例如，平均而言，人類嬰兒在一歲時開始走路，而動物寶寶可能會立即或在出生後幾小時或幾天內開始走路。
- 2) 人類比大多數動物的壽命更長。
- 3) 人類在地球上具有主導地位。
- 4) 人類因CS而享有優勢。
- 5) 人的身份由兩部分組成：身體和CS。它是一種雙重身份，在宗教和哲學中通常被稱為由身體和靈魂組成的雙重身份。

> CS帶給我們的洞見

人類在身體和CS的成長和成熟都很緩慢。人整體發展是二重的。相比之下，非人類物種的成長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是單向的(僅身體)，因為它們缺乏廣泛而複雜的人類意義上的CS。人類緩慢的身體生長和成熟都需要在兩個層面上取得進步。人體生長成熟的過程變慢了，可以說是因為人類參與了以CS為代表的第二次生長成熟過程。

CS 應該有助於回答《科學美國人》特刊(2018年9月)封面上的難題：「人類：為什麼我們不同於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物種。」如上所述，人類憑藉CS而與其他物種不同。下圖說明了為什麼人類是文化人。



> 文化人與簡約原則

上圖所呈現的是CS可以解釋四種不同的人類特徵。CS可以解釋人類個體和群體的無數具體行為，以及社會和文明的各種動態。因此，CS與簡約原則相符合：使用少的變量來解釋更多的現象。■

來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 2011 年 7 月 22 日的 挪威恐怖襲擊

Pål Halvorsen,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報刊編輯，挪威



烏托亞島的主樓，在其上有69人被殺。
來源：Pål Halvorsen。

「事情結束了，其再現仍未。」
Alexander, J. C. & Gao, R. (2012)

Fjotolf Hansen，比較為人所知的名字是 Anders Behring Breivik。他於 2011 年 7 月 22 日在挪威發動了兩次恐怖襲擊，第一次是在挪威的政府行政區，第二次是在工人青年團(Worker's Youth League)舉辦夏令營的烏托亞島(Utøya)。十年後的今天，挪威社會仍在努力解決隨後引發的問題。這場襲擊造成了77人死亡，多人受傷。他們不只是襲擊了挪威，也同時襲擊了整個世界，因為這場夏

令營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參加。此外，國際媒體也報導了整起襲擊事件，關於襲擊事件會不會引發國際上的模仿效應，這類問題也馬上被拋了出來，但其實挪威社會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隨之而來的現實選擇。許多人在事件發生後的訪談中都強調了襲擊發生的時間，那是奧斯陸(Oslo)的大多數人都在度假，城裡沒什麼人的夏季中旬。這樣的時機點使社會在面對這樣可怕的事件時可說是毫無準備，人們的臨場反應也沒有預期的那麼快。在事件中，有一名以全名投降的恐怖分子，他在襲擊發生前曾廣泛地宣傳一份「宣言」。人們正以這份現有的素材為

出發點尋找「答案」。兩個不同的法庭心理學委員就以相同的研究方式去探究布雷維克是否心理正常，但得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第一個委員會發現他患有妄想型思覺失調症，而第二個委員會發現他有自戀型人格疾患，但認為他在襲擊的期間始終保持清醒。奧斯陸地方法院認定Breivik在神智清醒的狀態下犯罪，對他採取挪威的最高刑罰：21 年的監禁，而且可能會延長監禁期限。此外，在入獄的期間 Breivik 也改變了自己的名字。時間來到2019 年 3 月 15 日，Brenton Tarrant 在紐西蘭的基督城對穆斯林發動了恐怖攻擊。他清楚地提到Breivik是他發動恐怖攻擊的靈感來源，因此挪威的「7 月 22 日」又再次成為了國際新聞。

「7 月 22 日」一詞在這起事件過後，已變成一種文化創傷的轉喻 (metonym)，其不僅反映了歷史事件本身，也反映了後續的過程，例如「9/11」事件也是如此。而這些事件提出了關於集體認同的迫切問題，並挑戰了先前關於「挪威性」(Norwegianness) 的概念。正如挪威產業總工會所提出的疑問：「我們『其中的一份子』怎麼會變成大屠殺的兇手？」這種為討論打下集體基礎的方式是文化創傷的指標之一。

有許多關於「7 月 22 日」的文學在國際上（不只是挪威）廣泛地大量出現。在這之中最著名的或許是 Åsne Seierstad 所著的紀實作品“*One of us*”，這本書的名字如實地反映著現實。此外，在學術文獻中，人類學家 Sindre Bangstad 在 2014 年寫下了“*Anders Breivik and the Rise of Islamophobia*”，其中細膩地探討了恐怖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動機為何。Bangstad 則是將伊斯蘭恐懼症的危險性作為主要的背景脈絡來研究。Sveinung Sandberg 研究了 Breivik 宣傳的「宣言」中所呈現的自我敘述，並發現了四種人們進行分析的方向：「戰略性的、具有決心的、統一的、支離破碎的。」他還指出分析 Breivik 的不同面向如何反映出，反伊斯蘭主義者所強調的 Breivik 的能動性與左翼勢力所強調的結構性方法之間的鬥爭。此外，其他涉及的研究領域還包括媒體研究、多元文化主義的辯論、信任與公民參與、反恐政策。以上這些研究領域都嘗試著去探討 7 月 22 日所造成的影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恐怖襲擊後政府曾投入資金協助奧斯

陸大學建立極端主義研究中心。根據 Cynthia Miller-Idriss 所說的：「現在這裡被公認是擁有最全面的全球極右翼極端主義學術及公共政策專業知識中心。」

雖然這裡不是提供關於 7 月 22 日學術研究資料的地方，但以下將舉出我和 Tore Rafoss 在挪威社會學雜誌中不停研究而成的「7 月 22 日」專題文章，以此作為呈現此事件全貌的幾個例子，而這些文章也涵蓋了不同的層面。第一篇文章：〈在恐怖主義後，挪威、法國和西班牙中的信任〉，研究了在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敘事作為公民對政治家及社會所信任的一部分元素，其重要性為何。文章以在2016年的尼斯和2017年的巴塞隆拿中所發生的恐怖襲擊為案例進行比較。

第二篇是關於記憶工作的文章：〈對恐怖主義作出回應的國家紀念館〉。文中透過比較俄克拉荷馬城國家紀念館和紐約的911國家紀念館的方式，分析了在奧斯陸及烏托亞島建立國家紀念館的過程。文章在結尾討論了，國家紀念館如何自相矛盾地掩蓋歷史事件和記憶行為的政治層面議題。

第三篇文章：〈7 月 22 日事件後法院的角色〉，透過記錄法院與事件生還者之間的關係、記憶工作和重建，去勾勒出法律社會學的研究議程。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了解法院如何應對特殊的極端事件。

接著將被評論的書是 Cynthia Miller-Idriss 的《家鄉的仇恨》、Gjelsvik 的編輯選集《工作方法》、Eirik Høyer Leivestad 的《民主中的恐懼和厭惡》和 Hallvard Notakeriet 的《工黨和 7 月 22 日》。

正如從這些文章和書評可以看見的那樣，社會學的力量就在於研究「7 月 22 日」的廣度。■

來信寄至：

Pål Halvorsen

<pal.halvorsen@universitetsforlaget.no>